

鲁迅杂文选

下

(一九三三——一九三六)

复旦大学中文系选编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崇实·····	1
为了忘却的纪念·····	4
战略关系·····	17
《杀错了人》异议·····	22
中国人的生命圈·····	27
文章与题目·····	30
二丑艺术·····	34
华德焚书异同论·····	37
《伪自由书》后记·····	41
“中国文坛的悲观”·····	76
小品文的危机·····	79
捣鬼心传·····	84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88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98
读几本书·····	109
拿来主义·····	112
水性·····	116
趋时和复古·····	118
门外文谈·····	122

《准风月谈》后记·····	149
随便翻翻·····	182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8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96
名人和名言·····	204
《花边文学》序言·····	210
《且介亭杂文》序言·····	215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17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222
半夏小集·····	225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30
“这也是生活”·····	247
死·····	253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59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265

崇 实^①

(一九三三年)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例如这《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现在叫作《自由谈》，总算我们是这么自由地在这里谈着。

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②和不准大学生逃难^③，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④，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⑤，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⑥，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费话不如少说，只剥⑦崔颢《黄鹤楼》诗⑧以吊⑨之，
曰——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⑩。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⑪，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⑫何处抗，烟花场⑬上没人惊。

一月三十一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由作者编入《伪自由书》。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急中，大好河山被吞没、割据，人民遭殃、受难，这时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却只管盗窃古物，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鲁迅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蒋介石这种卖国投降政策而写的。

②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侵占山海关，国民党反动政府即把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古物装箱南运。

③ 一九三三年一月山海关失陷后，北京也已危险，国民党政府既禁止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又不准学生停课和离开北京。

④ 这是顾颉刚说的话。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现代评论派”的成员。一九二三年他在关于夏禹的考证文章中，毫无根据地把禹说成一条虫，鲁迅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对此进行了嘲讽。

⑤ “中坚分子”，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伪国民党教育部给北京

各大学电中曾有“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一语，鲁迅对此进行了讽刺。参见鲁迅另一篇杂文《学生和玉佛》。

⑥ “名”和“口”皆是用来计人数的。一名口，即一个人。

⑦ 剥，指“生吞活剥”的“剥”，摹仿的意思。

⑧ 《黄鹤楼》诗是唐朝诗人崔颢写的。原文是这样：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楼址在今湖北武昌长江边）

⑨ 吊，凭吊、哀伤的意思。崔颢《黄鹤楼》诗是凭吊古迹，鲁迅此处则是摹仿崔颢的诗用来嘲讽国民党名为保护古物，实则卖国投降的反动丑恶面目。

⑩ 文化城，指北京。当时北京的一批反动文人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呈请反动政府把北京变为不设防的“文化城”，实际上是把北京拱手送给日寇。

⑪ 专车队队，指国民党军队南逃时运载大批财物的一列列专车。前门站，北京旧火车站。

⑫ 榆关，现在的山海关。

⑬ 烟花场，指舞厅、妓院。此句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民族危机无动于衷。

为了忘却的纪念^①

(一九三三年)

—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②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③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④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⑤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⑥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⑦，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象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象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

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抓”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⑧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⑨。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⑩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

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⑪，觉得好象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⑫。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⑬，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⑭，印《艺苑朝华》^⑮，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⑯。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

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⑰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⑱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⑲。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②①}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

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②，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③。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④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纪念我，象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沈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沈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

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缙衣。”^{②4}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②5}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②6}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②7}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②，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沈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沈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③《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后由作

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参见《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注⑦）。在五位青年作家被害两周年时，鲁迅怀着深沉的感情写下这篇文章，追忆了与柔石等一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经过，歌颂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表现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恨和对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② 竦(sǒng 耸)身，纵身上跳。

③ 五个青年作家即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和冯铿。

④ 《文艺新闻》，参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注①。

⑤ 彼得斐(一八二三——一八四九)，现在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家、诗人。一八四九年在反抗沙皇军队的战斗中牺牲。除诗歌外，还写有政论、剧本等。

⑥ 《奔流》，参见《二心集》序言注②。

⑦ 罗曼谛克，英语 Romantic 的音译，意为“浪漫的”。

⑧ 丸善书店是当时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

⑨ 惴惴(zhuì 缀)，恐惧、不安的样子。

⑩ 三道头是指当时上海租界里的外国巡捕。这种巡捕在制服臂章上有三条横的标记，所以被称为“三道头”。

⑪ 方孝孺(一三五七——一四〇二)，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的文学博士。一四〇二年(明建文四年)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永乐)起兵攻陷南京，自立称帝，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并责骂燕王为叛贼，被杀，并灭十族。

⑫ 朝华社，一九二九年一月鲁迅和柔石等几个青年一起成立的文艺团体。鲁迅在《柔石小传》(收入《二心集》)中说过：“朝华社，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出版的有《朝华》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五本。”“华”通“花”，朝华社亦作朝花社。

⑬ 《朝花旬刊》，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创刊，鲁迅、柔石合编。

⑭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朝花社预定的出版物之一，共出两集，即《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收比利时、捷克、法国、匈牙利、俄国和苏联、犹太、南斯拉夫、西班牙等国家与民族的短篇小说二十四篇。

⑮ 《艺苑朝华》，朝花社计划出版的外国美术作品选。原定出十二种，实际只出了五种：《近代木刻选集(一)》、《落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

⑯ 落谷虹儿是现代日本画家。叶灵凤当时所画的刊物封面和书籍插图常模仿甚至剽窃落谷虹儿的。

⑰ “人心惟危”，语出《书经·大禹谟》，意思是人的心地险恶难测。鲁迅此处是指剥削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的虚伪、冷酷、尔虞我诈的卑劣品质。

⑱ 戈理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通译高尔基，苏联作家。生于木工家庭，青少年时曾在各地流浪，一八九二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〇一年起因参加革命工作几次被捕；一九〇五年与列宁会面；一九〇六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反映了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历程。一九三四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是他写的反映资产阶级家庭三代历史的长篇小说。

⑲ 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时，日寇轰炸焚烧在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当时许多书籍被烧掉。但柔石这两部译稿并没有烧掉，而是被商务印书馆积压下来，几年后才出版。《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改名《颓废》，署名赵璜译，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丹麦短篇小说集》，署名金桥、淡秋选译，收小说十七篇，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版。

⑳ 《拓荒者》，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⑳。

㉑ “坐化”，佛教名词。传说有些和尚临终时，常盘膝而坐，安然死去，叫做“坐化”。《说岳全传》(清朝钱彩著)记载杭州一和尚，因为反对秦桧，秦桧派了差役何立来捉他，当何立刚到庙门前，和尚就死去。

⑳ 偈(jì)子,佛经中的带哲理性的短篇唱词。

㉑ 涅槃,参见《忽然想到(五至六)》注⑨。

㉒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请参阅《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

㉓ 《北斗》,参见《答北斗杂志社问》注①。

㉔ 参见《“连环图画”辩护》注⑱。

㉕ 白莽的哥哥,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

㉖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侵略上海,鲁迅当时居住的北川公寓陷于战火之中。一月三十日,鲁迅一家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又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见《鲁迅日记》)。

㉗ 即向秀,参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㉔。嵇康、吕安被杀后,向秀曾作《思旧赋》哀悼他们。文章很短,只有一百五十多字,但情辞沉痛,很著名。见《文选》卷十六。

战略关系^①

(一九三三年)

首都《救国日报》^②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③，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血的确流过不少，正在流的更不少，将要流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这都是反对运动者的血。为着什么？为着战略关系。

战略家在去年上海打仗^④的时候，曾经说：“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这样就退兵；过了两天又说，为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这样就停战。此后，“第二道防线”消失，上海和议^⑤开始，谈判，签字，完结。那时候，大概为着战略关系也曾经见过血；这是军机大事，小民不得而知，——至于亲自流过血的虽然知道，他们又已经没有了舌头。究竟那时候的敌人为什么没有“被诱深入”？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

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⑥不至于被国联^⑦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脏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⑧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罢。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

二月九日。

【备考】

奇文共赏 周敬济

大人先生们把“故宫古物”看得和命（当然不是小百姓的命）一般坚决南迁，无非因为“古物”价值不止“连城”，并且容

易搬动,容易变钱的原故,这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冷嘲热讽!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居然从首都一家报纸上见到赞成“古物南迁”的社论;并且建议“武力制止反对”,“流血在所不辞”,请求政府“保持威信”,“贯彻政策”!这样的宏词高论,我实在不忍使它湮没无闻,因特不辞辛苦,抄录出来,献给大众:

“……北平各团体之反对古物南迁,为有害北平将来之繁荣,此种自私自利完全蔑视国家利益之理由,北平各团体竟敢说出,吾人殊服其厚颜无耻,彼等只为北平之繁荣,必须以数千年古物冒全被敌人劫夺而去之大危险,所见未免太小,使政府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聚而歼之,则古物必被敌人劫夺而去,试问将来北平之繁荣何由维持,故不如先行迁移,俟打倒日本,北平安如泰山后,再行迁回,北平各团体自私自利,固可恶可耻,其无远虑,亦可怜也,其反对迁移之又一理由,则谓政府应先顾全土地,此言似是而实非,盖放弃一部分土地供敌人一时之占领,以歼灭敌人,然后再行恢复,古今中外,其例甚多,如一八一二年之役,俄人不但放弃莫斯科,且将莫斯科烧毁,以困拿破仑,欧战时,比利时,塞尔维亚,皆放弃全部领土,供敌人蹂躏,卒将强德击破,盖领土被占,只须不与敌人媾和,签字于割让条约,则敌人固无如该土何,至于故宫古物,若不迁移,设不幸北平被敌人占领,将古物劫夺而去,试问中国将何法以恢复之,行见中国文明结晶,供敌人战利品,可耻孰甚,……最后吾人奉告政府,政府迁移古物之政策,既已决定,则不论遇如何阻碍,应求其贯彻,若一经无见识无远虑之群愚反对,即行中止,政府威信何在,故吾主张严责张学良,使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若不得已,虽流血亦

所不辞……”

《申报》《自由谈》。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由作者编入《伪自由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到一九三三年，日寇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妄想吞并整个中国。蒋介石集团继续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自动放弃北平。鲁迅在本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战略关系”、“引敌深入”为借口卖国投降、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以及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进行“分赃”的阴谋。

② 《救国日报》是当时在南京出版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

③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时任东北军总司令，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全部东北。此时，他任北平行营主任。

④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起了进攻，蒋介石不准抵抗，并下令把驻沪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调走。十九路军在调出的路上正与日寇相遇，由于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由于国民党破坏上海的抗战，十九路军被迫撤退。

⑤ 上海和议，指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从上海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暗中与日寇进行勾结，极力破坏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最后，在日寇的侵略和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下，于同年五月五日正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完全答应了日寇提出的屈辱条件，允许日军驻留上海，并取缔抗日活动。这一反共卖国的投降协定一公布，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⑥ 满洲国,指日本侵占东北后所建立的傀儡政府,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在长春成立,一九三四年改为满洲帝国。

⑦ 国联,参阅《“友邦惊诧”论》注③。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即求乞于国联,于是一九三二年春,国联派出所谓调查团来中国进行调查。同年十月,发表了荒谬绝伦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公开与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妄图消灭中国的一切革命运动,充分暴露了国联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⑧ “一·二八”抗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一月三十日从南京仓惶迁都洛阳,并把洛阳定为行都,把西安定为陪都。

《杀错了人》异议^①

(一九三三年)

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②，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③。到二次革命^④时，表面上好象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⑤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⑥，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

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⑦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象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记得原稿在“客客气气的”之下，尚有“说不定在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

【备考】

杀 错 了 人

曹聚仁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

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倭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癆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受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倭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早杀溥

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斲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由作者编入《伪自由书》。

鲁迅这篇文章是针对曹聚仁的文章《杀错了人》而写的。曹聚仁在文章里说袁世凯杀革命党人是“杀错了人”，鲁迅指出他分析问题的观点和方法错了。袁世凯是个反革命，他是一定要杀人的。评价他不是用错不错的尺度，而要用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尺度。鲁迅把历史上的教训与现实斗争联系起来，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要高度警惕，要彻底揭露，不要受骗。

曹聚仁，浙江浦江人，文化工作者，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②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实行反革命专制独裁，一九一二年指使黎元洪杀害了在武昌起义中立过功的革命党人多人。以后又发布“治安警察条例”、“乱党自首条例”、“惩办国贼条例”等法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革命血腥大屠杀。

③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攻占南京，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当时革命军的领导人在反革命势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就主张南北议和，并

向袁世凯提出包括举袁为临时总统在内的五项保证和条件，以取得清帝退位；袁世凯当时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理大臣，统率水陆各军，镇压革命。后见局势不可挽回，便施展阴谋，以图窃取“民国”大权。二月六日，袁发出“赞成共和”电；十二日，清帝退位；十三日，孙中山辞总统职；十四日，参议院一致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三月十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所谓“共和”政权，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结果被反动军阀、卖国贼袁世凯窃取了。

④ 二次革命，参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⑬。

⑤ “国民公仆”，原由英语 Your Servant（即“你的仆人”或“你的勤务员”之意）译来，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常以此掩饰自己的阶级本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职位时，也常以此自我标榜。

⑥ 军政执法处，袁世凯在步军统领衙门中设立的特务机关。

⑦ 清朝被推翻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封建官僚、投机政客的活动，清废帝依据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仍然保持皇帝的称号。袁世凯窃国之后，不但以大量金钱维持清室挥霍，还维护清室的种种特权，甚至曾演出过命令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的礼节祝贺清废后“皇寿”的丑剧。

中国人的生命圈^①

(一九三三年)

“蝼蚁尚知贪生”^②，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

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③，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也非“边疆”^④，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⑤的。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⑥，一片瓦砾。“腹地”里

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糊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⑦。

其实，这预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

但这一番话，阔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但有飞机，还有他们的“外国”！

四月十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由作者编入《伪自由书》。

一九三三年，日寇大举向华北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予以抵抗，反而变本加厉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鲁迅在本文中，怀着满

腔愤懑之情，用曲笔抨击了蒋介石集团卖国反共的罪行。

② 原语见《史记》卷六六《伍子胥传》：“向令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后在戏曲中常见到“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的话。

③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在二月将古物从北京南运后，又于三月五日起分批运到上海，存放在法租界的中央银行仓库中，计有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一箱。

④ “腹地”指江西等工农红军根据地，“边疆”指热河一带。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进犯热河，出动飞机滥炸，致使当地人民死伤惨重。同时，蒋介石正以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也用飞机狂炸。

⑤ 见《三国志》卷三五《蜀志·诸葛亮传》：“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的“×世”，是说不知何世，是讽刺的意思。

⑥ 麇(chán 缠)，集市。

⑦ “生命○”，“○”同“零”，即完了的意思。

文章与题目^①

(一九三三年)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②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③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④民命，杀戮清流，做了第一种^⑤。李自

成^⑥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⑦。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氏^⑧之先，原是轩辕黄帝^⑨第几子之苗裔^⑩，遁于朔方^⑪，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⑫？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⑬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原题是《安内与攘外》

五月五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

家干。后由作者编入《伪自由书》。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召开七省治安会议，再度策划对红色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并且叫嚷：“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处罚”。反动报刊上接连发表了许多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文章。鲁迅在本文中，引用历史事例，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本质，勾画了这伙卖国贼的无耻嘴脸。

② 谥(shì 式)法，封建社会人死以后按其生前事迹给以褒贬的称号。此处借用这个词讽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

③ 征，“引证”的意思，“远征晋宋”，就是引晋朝、宋朝的事例为证。

④ 菅(jiān 肩)，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多生于山坡草地。“草菅”，指野草、杂草，比喻轻贱之物。“草菅民命”，就是指反动统治阶级杀害人民如同割草一样。

⑤ 清流，参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⑳。

满族首领努儿哈赤(即清太祖)在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登可汗位，第三年(万历四十六年)侵入明朝国界。这时明朝的统治已到了极端腐败的时代，为了进一步压迫和镇压人民，统治者在全国各地设立了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镇抚司等。魏忠贤的阉党又把大批反对他的士大夫，即所谓“清流”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戮。

⑥ 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在襄阳建立革命政权，称新顺王；不久进占西安，建大顺国，改元永昌。次年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退出北京。一六四五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

⑦ 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清兵攻山海关，镇守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开关降清，并联合清兵镇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⑧ 爱新觉罗是清王室的姓。满洲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就

是金朝后裔的意思。

⑨ 轩辕, 传说中黄帝的名字。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黄帝者, 少典之子, 姓公孙, 名曰轩辕。”

⑩ 苗裔(yì 意), 后代。

⑪ “遁”, (dùn 盾), 逃避; 朔方, 即北方。

⑫ 魏忠贤, 明朝天启时太监, 是一个极其残暴、阴险的刽子手, 曾用特务机关“东厂”杀了很多人。当时, 封建统治集团内的无耻之徒都谄媚他, 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 “群小益求媚”, “相率归忠贤, 称义儿”, “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

⑬ 这是帝国主义奴才刚毅的话。刚毅, 满洲镶蓝旗人, 曾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是清王公大臣中的反动顽固分子, 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 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赠与朋友, 而必不畀(bì 币, 给予的意思)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他所说的朋友, 指英、美、日等帝国主义; 家奴, 指汉族人民。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也说过: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当亡国奴, 尚可苟延残喘; 若亡于共产党, 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能。”

二丑艺术^①

(一九三三年)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②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④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⑥！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⑦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⑧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六月十五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丰之余。后由作者编入《准风月谈》。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有一批反动文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欺骗群众,有时以“在野派”相标榜。他们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攻击的同时,也演出一点对其主子“小骂大帮忙”的丑剧。胡适之流的“新月派”,以及继之而起的所谓“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论语派”,就扮演了这种角色。鲁迅这篇文章,撕下了他们的假面,戳穿了他们玩弄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把

戏，形象地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帮闲和帮凶的本质。

② 这儿指的是“绍兴戏”，又称“文乱弹”和“绍兴大班”，解放后改称“绍剧”。

③ 趋奉，趋炎附势、奉承拍马；清客，封建社会贵族官僚豢养于门下的食客、帮闲。他们平时不务正业，专门陪着主子谈文、下棋，或为主子出谋划策。这里用以讽刺卖身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伙反动文人。

④ “义仆”，是过去旧戏中忠心耿耿为主子效命的老仆人。在旧戏中，“义仆”的形象很集中地体现着封建道德，是作为正面人物被美化的，所以用“老生”扮演。

⑤ 谏诤 (jiàn zhēng 建争)，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直言规劝。这里是指奴仆对主子的规劝。

⑥ 这句话原来出自“绍兴戏”传统剧目《五美图》中的一折《游园吊打》。一个恶公子带着帮凶老丁（二丑扮）去强抢人家女儿，被逮住吊打；在恶公子一下一下吃着马鞭的时候，老丁就回头向台下看客说：“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了！”鲁迅借用这句话，揭露了那些反动文人装出与国民党反动派“并非一伙”，实则充当帮闲、帮凶的丑恶嘴脸。

⑦ 炎，指权势。分着余炎，倚仗着主子的权势。

⑧ 萧伯纳，参见《我还不能“带住”》注⑦。萧伯纳一九三三年曾来中国访问，二月十七日到达上海，鲁迅曾去宋庆龄家出席欢迎他的便宴。上海文化界也举行过欢迎会。他在上海的活动和发表的演说，曾受到许多反动文人的攻击。

华德焚书异同论^①

(一九三三年)

德国的希特拉^②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③。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④，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⑤，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⑥；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从“剧秦”^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⑧……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刺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⑨，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⑩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拉先生们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刺伯人也是

“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①，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②？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门徒们在奥国一被禁止，连党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③。最有趣的是因为不准叫口号，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

这真是一个大讽刺。刺的是谁，不问也罢，但可见讽刺也还不是“梦呓”，质之黄脸干儿们，不知以为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后由作者编入《准风月谈》。

本文从中国的秦始皇和德国法西斯焚书的异同谈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作了尖锐的抨击；同时，和传统的见解不一样，作者对秦始皇作了新的评价。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上台，自称

国家元首。他立即对外实行武装侵略，对内加强纳粹党的法西斯统治：解散国社党（即“纳粹”）以外的各政党，禁止工人罢工，镇压共产党，排斥犹太人，焚烧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四月，蒋介石效法希特勒的国社党，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和“力行社”，并在官办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纳粹的活动；同时日益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更残酷地镇压左翼文化运动，查禁图书，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为了抗议德国法西斯和揭露蒋介石以希特勒为师，在国内加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五月十三日鲁迅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亲自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并将抗议书在报上发表，其中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和特务组织也进行了抨击。国民党反动派不久即暗杀了杨杏佛，并将鲁迅列入暗杀名单。鲁迅毫不畏惧地参加了杨杏佛的追悼会，并在杨杏佛被暗杀后的第十天写下了本文。

② 希特拉（一八八九——一九四五），现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纳粹德国头号战犯。

③ 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二一〇），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庄襄王的儿子，秦朝开国皇帝。公元前二四六年即位，二二一年他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当时，有一批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利用儒家经典，颂古非今。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把秦以前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古籍尽行烧毁。

④ 秦始皇为了使自己的统治传至万世，废自古以来的谥法，以数计世，故自称“始皇帝”；他死后，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谋杀太子扶苏，拥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称秦二世。秦二世在位三年（公元前二〇九——二〇六），被赵高杀害。秦二世在位期间，陈胜、吴广、刘邦、项籍先后起义，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⑤ 中国历史上用别国人担任官职的叫“客卿”，例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就是楚国人。

⑥ 据《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为古代名医。邯郸当时是赵国都城，咸阳是秦国都城。

⑦ “剧秦”，意思是很短促的秦朝。原语见扬雄《剧秦美新》：“二世而亡，何其剧与(欤)！”《文选》李善注：“剧，甚也，言促甚也。”

⑧ 战国时，诸侯王公割据一方，各国制度不同，车辆宽度不一，文字互有差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治驰道，规定车宽六尺，车辙一致，这就是“车同轨”；又推行宰相李斯制定的文字，即依据周朝笔划繁杂的大篆（籀文）和战国齐鲁一带笔划较简单的古文制定的新字体（后称秦篆或小篆），这就是“书同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一制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两项措施，当时有积极意义。

⑨ 亚历山大德府，即亚力山大城，在埃及。公元前三二三年到三〇〇年，为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亚力山大图书馆在托勒密一世（公元前三二二——二八五）时创立，藏书极富。公元六四〇年阿拉伯人攻入亚历山大城后，由回教主奥玛尔下令将存书全部焚毁。

⑩ 《可兰经》，即《古兰经》，伊斯兰教的经典，相传为该教创立人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陆续颁布的教义和教律，经后人整理成册，流传至今。

⑪ 黄脸干儿们，指效法希特勒的国民党反动派。

⑫ 指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上所载署名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类反动文章。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⑬ 一九三三年初希特勒上台后，即积极进行德奥合并运动，奥地利的法西斯党也希望奥国能早日合并于德国。当时奥总理陶尔斐斯一方面压迫共产党，一方面也反对法西斯的合并运动，他在五月间下令除国旗外禁止悬挂一切政党旗帜，六月十九日解散奥国国社党，禁止佩戴该党党徽，英斯白鲁地方的法西斯党党员使用黑红白三色玫瑰花代替卐字标识。

《伪自由书》后记^①

(一九三三年)

我向《自由谈》^② 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③。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

“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

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

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④，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

“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干叔奸侄女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

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

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的狂嗥起来，好象

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⑤。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⑥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

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

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

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材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出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号召，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俘虏。

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

[微知]

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

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

水手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象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

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

黎烈文未入文总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

[逸]

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

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

[农]

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⑦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⑧，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介绍，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

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六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⑨,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

编 辑 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麓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编 者

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自由谈》态度转变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

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

[闻]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⑩，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⑪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

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⑫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

法鲁

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

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来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

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⑬的副会长杨杏佛(铨)^⑭遭了暗杀。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里，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

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象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

[道]

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教授传道的圣境^⑮，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象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

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

自由的风月

顽石

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种“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锺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①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

张资平挤出《自由谈》

粹公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性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性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除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麓，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鬬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

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谈》来。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的“解放词”^{①⑦},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

曾今可准备反攻

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

[如]

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①⑧}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①⑨}(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

《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之经过也。

解题既毕，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课，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个请帖；展而恭读之，则《新时代月刊》之请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请帖！折而藏之，以为传家之宝。

《新时代》请客而《文艺座谈》生焉，而反攻之阵线成焉。报章煌煌记载，有名将在焉。我前天碰到张凤老师，带便问一个口讯；他说：“谁知道什么座谈不座谈呢？他早又没说，签了名，第二天，报上都说是发起人啦。”昨天遇到龙榆生先生，龙先生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我说：“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遥领盛情，志此谢谢！

但这“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第一期，却已经罗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专为我而作的——

某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议到虹口公园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说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

我们就进了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随便翻看着书报。内山看见我们就连忙跑过来和我们招呼，请我们坐下来，照例地闲谈。因为到内山书店来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人，内山也就知道点中国的文化。他常和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情形，却不大谈到中国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国人对他怀疑。

“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内山还和我们谈了好些，“航空救国”等问题都谈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

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内山书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园去了。

不到一礼拜(七月六日)，《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就加以应援，并且廓大到“左联”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该写作“鲁迅”的故意的错误，为的是令人不疑为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内山书店与左联

《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份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闻此种侦探机关，除内山以外，尚有日日新闻社，满铁调查所等，而著名侦探除内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岛，中村等。

[新皖]

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

从别人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作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但也有人来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谈》上，竟揭载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谈“文人无行”

谷春帆

虽说自己也忝列于所谓“文人”之“林”，但近来对于“文人无行”这句话，却颇表示几分同意，而对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视为“道学先生”的偏激之言。实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颀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对着这些痛心的事实，我们还能够否认“文人无行”这句话的相当真实吗？（自然，我也并不是说凡文人皆无行。）我们能不兴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吗？

自然，我这样的感触并不是毫没来由的。举实事来说，过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被人斥为“轻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却唠唠叨叨辩个不休，现在呢，新的事实又证明了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

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见二月崔在本报所登广告），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做“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指他的朋友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开出卖（见第五号《中外书报新闻》）。这样的大胆，这样的阴毒，这样的无聊，实在使我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却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当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无畏的精神。

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

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噪，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

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对于这班丑类，实在不应当象现在一样，始终置之不理，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应当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文坛，做一番扫除的工作！

于是祸水就又引到《自由谈》上去，在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便看见一则启事，是方寸大字的标名——

张资平启事

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所写文章均出自信，而发见关于政治上主张及国际情势之研究有错觉及乱视者，均不惜加以纠正。至于“造谣伪造信件及对于意见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诬毁”皆为我生平所反对，此须申明者三；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动。我连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故凡容纳我的这类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对于该刊物之其他文

字则不能负责，此须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以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对于《自由谈》编辑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也登出相对的启事来——

黎烈文启事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总之：较关紧要的问题，是“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者是谁？但这事须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张资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国真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访问记》登在《中外书报新闻》^②的第七号（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关于“为妾”问题等的一段——

（四）启事中的疑问

以上这些话还只是讲刊登及停载的经过，接着，我便请他解答启事中的几个疑问。

“对于你的启事中，有许多话，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让我问一问？”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射？”

“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顺便在启事中，另外指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那不能公开。”自然他既然说了不能公开的话，也就不便追问了。

“还有一点，你所谓‘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这又何所指？”

“那是讲我在文艺以外的政治见解的东西，随笔一类的东西。”

“是不是象《新时代》上的《望岁小农居日记》一样的

东西呢？”(参看《新时代》七月号)我插问。

“那是对于鲁迅的批评，我所说的是对政治的见解，《文艺座谈》上面有。”(参看《文艺座谈》一卷一期《从早上到下午》。)

“对于鲁迅的什么批评？”

“这是题外的事情了，我看关于这个，请你还是不发表好了。”

这真是“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②①}，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这位文学家的嘴脸。《社会新闻》说他“鬬懦”^{②②}，固然意在博得社会上“济弱扶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启事上的自白，却也须照中国文学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内山书店小坐”，一定又会从老板口头听到)，因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虽然“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而无奈“还是不发表好了”何？但既然“还是不发表好了”，则关于我的一笔，我也就不再深论了。

一枝笔不能兼写两件事，以前我实在闲却了《文艺座谈》的座主，“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写起来却又很简单，他除了“准备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艺。

崔万秋先生和这位词人，原先是相识的，只为了一点小纠葛，他便匿名向小报投稿，诬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五号)上精印了出来——

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

《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③。轻恙重症，同时夹攻，渐使这柔嫩的诗人兼词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时事新报》(七月十日)上却又是一个启事，好象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

曾今可启事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

这就完了。但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

我剪贴在上面的《谈“文人无行”》，其实就是这曾张两案的合论。但由我看来，这事件却还要坏一点，便也做了一点短评，投给《自由谈》。久而久之，不见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

满纸，这便是曾经排过，又被谁抽掉了的证据，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的也难说。现在就抄在这里罢——

驳“文人无行”

“文人”这一块大招牌，是极容易骗人的。虽在现在，社会上的轻贱文人，实在还不如所谓“文人”的自轻自贱之甚。看见只要是“人”，就决不肯做的事情，论者还不过说他“无行”，解为“疯人”，恕其“可怜”。其实他们却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现在的种种，也并不是“无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虽是极低劣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可以卖掉一批的。我们在夜里走过马路边，常常会遇见小瘪三从暗中来，鬼鬼祟祟的问道：“阿要春宫？阿要春宫？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生意也并不清淡。上当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乡下人。然而这至多也不过四五回，他们看过几套，就觉得讨厌，甚且要作呕了，无论你“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也无效。而且因时势的迁移，读书界也起了变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这样的东西了；一部份是简直去跳舞，去嫖妓，因为所化的钱，比买手淫小说全集还便宜。这就使三角家之类觉得没落。我们不要以为造成了洋房，人就会满足的，每一个儿子，至少还得给他赚下十万块钱呢。

于是乎暴躁起来。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象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误解,以为他真在这样想。他是聪明绝顶,其实并不在这样想的,现在这副嘴脸,也还是一种“生意经”,用三角钻出来的活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只好经营这一种卖买,才又可以赚些钱。

譬如说罢,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过“革命文学家”,借此开张书店,吞过郭沫若的许多版税,现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还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装饰的。此刻那里还能做这样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自己才是一个干净刚直的作者,而况告密式的投稿,还可以大赚一注钱呢。

先前的手淫小说,还是下部的勾当,但此路已经不通,必须上进才是,而人们——尤其是他的旧相识——的头颅就危险了。这那里是单单的“无行”文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上文所说,有几处自然好象带着了曾今可张资平这一流,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④。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费,出版卖钱,即使他无须养活老婆儿子,我也满不管,理由也很简单: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

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辈，竟谓我策动“腰斩张资平”。既谓矣，我乃简直以 X 光照其五脏六腑了。

《后记》这回本来也真可以完结了，但且住，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因为剪下的材料中，还留着了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所以特地将它保存在这里。

这篇文章载在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里——

新 儒 林 外 史

柳 丝

第一回 揭旗扎空营 兴师布迷阵

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村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村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村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

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村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编辑者的信，大意说：兹有署名柳丝^{②5}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象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云云。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②6}的话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师，又怎么看得见“天堂”？“柳丝”是杨村人先生还在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时候已经用起的笔名，这无须看内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时，就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子下做着这样的幻梦，将自己写成了这么一副形容了。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栢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②7}。

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但据《社会新闻》（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说，则又是“左联”阻止的——

杨村人转入 AB 团

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村人，近已由汉来沪，闻寄居于 AB 团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该团活动矣。前在《大晚报》署名柳丝所发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杨手笔，内对鲁迅大加讽刺，但未完即止，闻因受左联警告云。

[预]

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村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说，“第三种人”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已经因了左翼理论家的凶恶的批评而写不出来了^②，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来未曾受人攻击，

自以为不可一世，现在要给他知道知道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份。先前何尝不如此呢，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份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所引的文字中，我以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学者”。但他们现在是另一个笔名，另一副嘴脸了。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⑨，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⑩之名，或以“人道”^⑪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⑫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沈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记。

注 释

① 《伪自由书》是作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寄给《申报·自由谈》

的杂文的结集，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共四十三篇（发表的三十七篇中收入三十六篇，另有七篇是未能发表的）。本篇是出版前所写的“后记”，未另发表。

关于《伪自由书》，鲁迅在该书《前记》中说过：“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却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鲁迅把杂文集取名为《伪自由书》，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辛辣讽刺。

本篇是三十年代初期思想文化战线上“围剿”同反“围剿”斗争的战斗纪录，是一卷尖锐鲜明、生动具体的反文化“围剿”的历史图画。一九三四年十月，作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又说，“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

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是鲁迅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显著特点。在本篇里，鲁迅以无所畏惧、正大光明的战斗态度和斗争艺术，全文收录了敌人攻击他的不少反面材料，在要害处点明每篇文章的反革命策略、阴谋手法和用意，总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和经验。他说，“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作者在本

篇中揭露出来的谣言诡辩、阴谋诡计、资产阶级政客作风和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等敌人的“老谱”，“贩子”、“骗子”们的“脚踏两只船”的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认识和投入今天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是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的。

② 《申报》，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⑤⑥，《自由谈》是它的副刊之一，从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办起，先后由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天虚我生(陈蝶仙)、周瘦鹃编辑，一直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约请新从法国回国的黎烈文编《自由谈》，内容侧重于杂文、短评等。一九三三年一月，鲁迅应郁达夫邀请，开始给《自由谈》写稿；从此，《自由谈》的面目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猛烈攻击。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刊出第一篇杂文《“逃”的合理化》(收入《伪自由书》时改题《逃的辩护》)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刊出《批评家与创作家》(收入《花边文学》时改题《看书琐记(三)》)为止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鲁迅在《自由谈》上先后用三十八种笔名共发表了一百四十一篇杂文。《自由谈》成为鲁迅在上海发表杂文最多的一块阵地。

③ 《大晚报》，国民党反动报纸。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上海创刊，后为孔祥熙收买。

④ 伦常，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为五伦，以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故称“伦常”。违反了这种伦常，就称“逆伦”。

⑤ 《社会新闻》，是国民党特务办的刊物，一九三二年十月创刊，先是三日刊，后改旬刊。

⑥ 真伪杂糅(róu 柔)，真假混杂。糅，混杂的意思。

⑦ 黎烈文，湖南湘潭人，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职。后来堕落为反动文人。

⑧ 《微言》，国民党文化特务、伪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所办的反

动刊物，一九三三年五月创刊，周刊。

⑨ 指鸳鸯蝴蝶派和类似的黄色、低级、无聊的文字。

⑩ 丁玲和潘梓年当时都是“左联”成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丁玲被捕后，叛变自首，成了可耻的叛徒，抗日战争时混入延安，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

⑪ 《蘧(qú 渠)庐絮语》，陈子展写的一个连载的专栏文章。

⑫ 《火炬》，《大晚报》文艺副刊，由反动文人崔万秋编辑。

⑬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成立的一个进步团体，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铨等发起，旨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⑭ 杨杏佛(一八九二——一九三三)，名铨，江西清江人，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任副会长兼总干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为蒋介石的特务所暗杀。

⑮ 梁实秋自美国留学归国后，曾任山东青岛大学教授。

⑯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原在《自由谈》上连载。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谈》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这事当时被一些资产阶级文人称为“腰斩张资平”。

⑰ 曾今可，反动文人，“礼拜五派”代表之一。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自己主办的《新时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上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发表有他自己作的一首《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且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⑱ 胡怀琛(一八八六——一九三八)，当时的“国学家”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之一。一九二八年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发表

《墨翟为印度人辨》，第十六号又发表《墨翟续辨》，后印成《墨子学辨》一书，荒谬地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谈》发表玄(茅盾)《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象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即写信向编者提出质问，说这是什么“任意讥笑，有损个人的名誉”。

⑲ 《涛声》，半月刊，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二年八月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

⑳ 《中外书报新闻》，一九三三年六月开始出版的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的一种周刊，包可华主编，中外出版公司发行。

㉑ 见《孟子·离娄》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眸子，眼珠；眊(mào 帽)，视力昏暗的意思。这句话的大意是：观察一个人，最好是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是掩饰不住他的内心的丑恶的。心思正派，眼睛就明亮；心思不正派，眼睛就昏暗。鲁迅用这句话，对张资平的作贼心虚、理屈词穷的丑态，作了辛辣的讽刺。

㉒ 闾(tù 榻)懦，原意为小户，可引申为卑下、地位低贱的意思。

㉓ 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了一本诗集《两颗星》，其中有一篇大事吹捧的“代序”署名崔万秋作。但是，崔万秋在七月二日《大晚报》附刊《火炬》和七月三日《申报》上刊登了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七月五日鲁迅写了一篇《序的解放》(载七日《自由谈》)，对曾今可“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的丑剧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㉔ 指张资平专写三角恋爱、四角恋爱的黄色小说。

㉕ 柳丝，即杨邨人。参见《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㉖ 卡尔，即马克思；伊理基，即列宁。

㉗ 韩侍桁在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也写了一篇《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

的言论是“一个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⑳ 苏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说因为“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所以“第三种人”将“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了。

㉑ 狮子身中的害虫，原为佛家的譬喻，指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分子，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中的投机分子。

㉒ 孝子，指叛徒杨邨人。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于《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鲁迅在《准风月谈·青年与老子》一文中曾给予讽刺，可参看。

㉓ 指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文化评论》创刊号）一文中假“人道主义文学”的名义以反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事。

㉔ 指托洛茨基派。托派分子王独清、余慕陶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展开》第一、二期合刊上都曾胡说他们比中国共产党还要革命：“我们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革命。”

“中国文坛的悲观”^①

(一九三三年)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象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②，李莼客和赵搗叔^③，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④，《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⑤，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器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⑥。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

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⑦,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象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利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八月十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悲观无用论》,署名旅隼。后由作者编入《准风月谈》。

一九三三年正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时期,有的人对斗争实质不加分析,一律目为混乱,散布悲观论调。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以阶级斗争观点,总结了历史经验,阐明了只要有“坛”,就“不

免有斗争”的真理,指出文坛非但不因此而“混乱”,反而由此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有力地批判了那些悲观论者,明确地告诉他们:“历史决不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

②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朝史学家。袁子才(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名枚,浙江钱塘(今杭县)人,清朝诗人。一七九七年(嘉庆二年、丁巳)袁枚死后,章学诚在《丁巳札记》内针对袁诗主性灵及收纳女弟子事,攻击袁为“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他还写有《妇学》、《妇学篇书后》、《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也都是攻击袁枚的。

③ 李莼客(一八二九——一八九四),即李慈铭,浙江会稽人,清末文学家。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字搗叔,浙江会稽人,清末书画篆刻家。李莼客在所著《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或“荒谬狂鄙”,并希望当时官府“一顿杖杀之”。

④ 指清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民报》,月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新民丛报》,半月刊,一九〇二年一月创刊于日本横滨。

⑤ 《新青年》,参见《我之节烈观》注⑦。“某某派”,系泛指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们。

⑥ 嚣俄(一八〇二——一八八五),通译雨果,法国文学家,著有小说《悲惨世界》等。霍普德曼,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⑤。一八三〇年二月,雨果的剧本《爱尔那尼》在巴黎法兰西戏院上演;一八八九年十月,霍普德曼的剧本《日出之前》在柏林雷兴剧院上演,都曾引起两派激烈斗争。拥护者与反对者竟至当场打了起来。

⑦ 林琴南,参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注②⑤。“五四”时期,他疯狂反对新文化运动,曾写《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

小品文的危机^①

(一九三三年)

仿佛记得一两月之前，曾在一种日报上见到记载着一个人的死去的文章，说他是收集“小摆设”的名人，临末还有依稀的感喟，以为此人一死，“小摆设”的收集者在中国怕要绝迹了。

但可惜我那时不很留心，竟忘记了那日报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现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小摆设”了。但如果他出身旧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②的人，则只要不很破落，未将觉得没用的东西卖给旧货担，就也许还能在尘封的废物之中，寻出一个小小的镜屏，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这就是所谓“小摆设”。先前，它们陈列在书房里的时候，是各有其雅号的，譬如那三脚癞虾蟆，应该称为“蟾蜍砚滴”^③之类，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现在呢，可要和它的光荣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

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④。在外，至少必须有几十亩膏腴^⑤的田地，在家，必须有几间幽雅的书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较为安闲，在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书桌一顶，烟榻一张，瘾足心闲，摩挲赏鉴。然而这境地，现在却已经被世界的险恶的潮流冲得七颠八倒，象狂涛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⑥，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⑦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⑧，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⑨，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⑩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⑪和陆龟蒙^⑫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

《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却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风，也觸着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⑬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却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鴉片雖然已經公賣，烟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里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里躡^⑭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

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八月二十七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现代》月刊第三卷第六期。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之流为代表的“论语派”大肆提倡“闲情逸致”的小品文，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并以此和革命文学相对抗，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帮凶，成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针对当时文坛上出现的这种“帮闲文学”而写成此文。

② 翰(hàn)墨，即“笔墨”，意指文辞、书法、绘画等。

③ 蟾蜍(chán chú 缠除)，蛤蟆。砚滴，砚水壶。蟾蜍砚滴，蛤蟆状的砚水壶。

④ “清玩”，指金石、书画、小古董、盆景等，可供剥削阶级闲居赏玩的东西。

⑤ 膏腴(yú 鱼)，肥沃的土地。

⑥ 兰亭，在浙江省绍兴县兰渚山上。公元三五三年，晋朝人王羲之作《兰亭序》。

⑦ 指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刻。云冈石窟分布于山西大同武周山。最大的石佛高达十七米，气魄雄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艺术创作。

⑧ 《六朝文絜》，六朝短篇骈体文选集，清朝人许梈编选。絜(xié 协)，规范的意思。

⑨ 即清谈，逃避现实的空谈。

⑩ 罗隐(八三三——九〇九)，唐末作家，著有《谗书》等。

⑪ 皮日休(约八三四——八八三)，唐末作家，著有《皮子文藪》。

⑫ 陆龟蒙(?——约八八一)，唐末作家，著有《笠泽丛书》。

⑬ 缜(zhěn 诊)密，细致精密。

⑭ 蹙(bì 壁)，原意是瘸腿，此处意为悄悄地、慢慢地。

捣鬼心传^①

(一九三三年)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②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象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③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肋，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④，枝指^⑤，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象“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

但是，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谓“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⑥的《鬼趣图》，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

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曌檄^⑦，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⑧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飈文豪”高长虹^⑨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⑩，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⑪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

而已。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忏。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心传(chuán 船)，原为佛教禅宗用语，指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传法授受；后来宋代理学家借用为圣人心性精义、精微法则的传授。鲁迅以此为题，指反动派凭了阶级本性，学来历代统治阶级的捣鬼术。他在本篇中，深刻地解剖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战术，尤其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及为其服务的投机分子施展其“祖传”的捣鬼本领，阳一套、阴一套，造谣诽谤，混淆视听，一味玩弄阴险诡谲的权术，当作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作者还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明确指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② 古树发光，是一种迷信；与后面的怪胎畸形等，都是当时一些反动报刊上经常刊载的古怪新闻。

③ 孪(luán 銮)，双生。孪子，即双生子，俗称双胞胎。

④ 骈(pián 蹠)，对偶，相合。骈拇，脚的大拇指与第二指连为一指。

⑤ 枝(qí 其)指，手的大拇指傍枝生出一指，成为六指。

⑥ 罗两峰(一七三三——一七九九)，清代画家，江苏甘泉(今扬州)人，名聘，字遯夫，两峰是其号。

⑦ 骆宾王，唐代诗人，婺州义乌（今在浙江）人，曾任临海丞；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署为府属。他代徐敬业写的《讨武曌檄》，见《骆丞集》卷四。曌(zhào 照)，武则天自制的十九字之一，义同“照”，以为己名。

⑧ 攒(cuán 攢)眉，紧蹙双眉，表示不愉快。

⑨ 高长虹，山西孟县人，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与鲁迅相识，曾得到很多帮助，并成为《莽原》的经常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六年跑到上海，成立“狂飚社”，发起“狂飚运动”，一面以鲁迅的名字招摇撞骗，一面又对鲁迅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鲁迅曾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揭穿其骗局。

⑩ 高长虹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载一九二七年一月《狂飚》第十四期）一文中说：“若夫其他琐事，如狂飚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

⑪ 威棱(léng 陵)，声威，威势。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 公开信^①

(一九三三年)

《文化列车》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对于这样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

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②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

“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

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③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④。”(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消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〇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

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伯纳肖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肖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肖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

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
康健。

杨邨人谨启。

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像画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并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猜猜；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⑤，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这就问得稀奇。李儵

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蠹贼”^⑥的。“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的问题也就落了空。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⑦或吴稚晖^⑧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现在请放心罢。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旗下^⑨，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中，先生也在内。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

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坐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报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⑩。这真说得栩栩^⑪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恁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⑫，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⑬，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

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⑭。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⑮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

无所不至，一到“清党”^{①⑥}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改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

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

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注 释

① 本篇发表于何种报刊，待查。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

杨邨人，叛徒、特务，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并混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稍后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 AB 团。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杨邨人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赤膊上阵，在《文化列车》第三期上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明目张胆地攻击鲁迅。为此，鲁迅写了这篇文章，回击了他的挑战，痛斥了杨邨人之流造谣生事的无耻行径，愤怒地揭穿了他们背叛革命的叛徒嘴脸，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② 儻，倏(shū 叔)的异体字，原意为犬快走，引申为疾速，忽然。

③ 司马懿，三国时代魏国的大将军。

④ 魏延，三国时代蜀国的将军，诸葛亮死后，和长史杨仪争权，起兵反蜀，兵败被杀。《三国演义》上说他头上生反骨，以后都用以借指怀有异心的人。

⑤ 绌(chuò 绰)，不足。左支右绌，形容能力不足，难以应付。

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办的《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上，发表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书后》一文，其中诬蔑鲁迅是

“人群的蠢贼”。

⑦ 《三国志演义》，参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⑤。诸葛亮、阿斗、魏延都是小说中的人物。

⑧ 吴稚晖，参见《答有恒先生》注⑱。

⑨ 杨邨人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公开声称：“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妄图以此与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左翼文艺运动相对抗。

⑩ 一九三〇年杨邨人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造谣诬蔑鲁迅“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奖的赏”，并用来为儿子庆贺周年，大开“汤饼会”。又捏造与会者赞美鲁迅儿子为“龙儿”，从而引起在坐的郁达夫的“伤感”，因为“他前年不幸夭折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

⑪ 栩栩(xǔ 许)，生动活泼的样子。

⑫ 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挑起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左”倾宗派主义的态度，对鲁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杨邨人也曾乘机写文章攻击鲁迅。鲁迅反驳他们的文章都收在《三闲集》中。

⑬ 封建时代祭祀所用的家畜叫牺牲。

⑭ 杨邨人化名柳丝写的《新儒林外史》（发表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诬蔑鲁迅对他的揭露和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

⑮ 张若谷，当时专写下流小说的市侩文人。

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当时共产党人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员以及国民党中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称之为“清党运动”。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①

(一九三四年)

一 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②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③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④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⑤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

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象西班牙的牛^⑥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⑦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⑧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烧书事件的先例^⑨。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⑩。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这是谎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⑪，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⑫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二 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⑬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⑭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⑮，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⑯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象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⑰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象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

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⑱，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東西^⑲，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⑳，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㉑，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㉒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㉓，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㉔。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㉕，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㉖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²⁷，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²⁸，所以以谈霸道为羞²⁹，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三 关于中国的监狱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³⁰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³¹，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³²，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³³之后，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

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象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④。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⑤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象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⑥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

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①，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②，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象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注 释

① 本篇是鲁迅应日本改造社之约而写的。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日本《改造》月刊，题为《火，王道，监狱》。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今年二月，我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做了三篇短论，是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三十年代前期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整个中国；蒋介石集团对外妥协，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猛烈抨击了蒋匪帮的法西斯统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粉碎了帝国主义奴才媚敌卖国的无耻谰言。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穿了历代统治阶级鼓吹的“王道”的骗局，指出“王道”和“霸道”不过是他们用以维护自己统治而交替使用的两手。这一深刻论断，是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完全符合的。

② 普洛美修斯，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④。

③ 燧人氏，参见《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注③。

④ 有巢氏，中国古代传说中发明在树上搭巢、教人们巢居的人。

⑤ 神农氏，中国古代传说中发明木制农具、教人种庄稼的人；又传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⑥ 西班牙有斗牛的风俗。斗牛的人两手高举一块红布，对牛撩拨，牛就向人触去。

⑦ 旧社会一种迷信的风俗，即用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叫“赛会”。

⑧ 列传，中国封建时代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之一，所记述的是对封建王朝有功或著名人物的事迹。

⑨ 秦始皇，参见《华德焚书异同论》注③。希特拉，参见同篇注②。

⑩ 宋代庄季裕的《鸡肋篇》载：“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袭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靖康，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年号。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钦宗与其父徽宗被金人俘虏。

⑪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破秦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阿房宫是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

⑫ 耶稣教称耶稣为“救世主”，还说耶稣所在之处有火光照耀。

⑬ 中里介山(一八八五——一九四四)，是日本通俗小说作者，曾写公开信攻击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⑭ 我国秦代统一全国，加强了和外国的往来，所以，外国如古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为“秦”。直到中国汉朝、晋朝的时候，外国人仍然称中国为“秦”。后来，中国和尚翻译佛经时又把梵文的“秦”转译成“支那”、“至那”或“脂那”，近代日本因此称中国为“支那”。

⑮ “朔北”就是北方的意思。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人，清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蒙族和满族都居住在中国北部各省，所以称“朔北的元和清”。

⑯ 满洲，即我国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之后，建立了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的傀儡政权，即伪“满洲国”。

⑰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极力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散布失败论调。本文所引的这段话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他在北京对新闻记者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的《北平通讯》）。

⑱ 指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⑲ 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称凭借所谓“仁义”治理天下的，叫“王道”；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治理天下的，叫“霸道”。

⑳ 指汉高祖刘邦。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身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在乡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㉑ 周武王姓姬名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公元前十一世纪，姬发联合西南各族东征殷朝，打败纣的军队，建立西周王朝。

⑳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人。生于破落奴隶主家庭,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孟子(约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

㉑ 《史记·伯夷列传》里记载:伯夷和叔齐是殷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姬发带兵攻打殷纣时,伯夷、叔齐曾“扣马而谏”,劝姬发不要去打,认为“臣下”攻打“君上”是不“仁”。“扣马”就是扣住缰绳,不让马走。古代称下对上的规劝叫“谏”。

㉒ 周武王伐纣,与纣的军队大战于牧野(在今河南淇县),《书经·武成》篇有“血流漂杵(chǔ 楚)”的记载。杵,舂米的工具。

㉓ 《史记·殷本纪》里记载:姬发死后,殷纣王之子武庚与管叔、蔡叔一起叛乱,周成王叫周公带兵消灭他们,将武庚、管叔、蔡叔杀死。“顽民”指殷朝遗民中拒不服从周朝统治的人。《书经·多士》篇说:周朝把殷的“顽民”迁到洛阳。后代统治者称不驯服于他们统治的人为“顽民”。

㉔ 绽(zhàn 栈),衣缝裂开。这儿指“王道”的虚伪性。

㉕ 古代称崇信孔子学说的人为“儒士”;称讲求神仙修炼的人为“方士”。

㉖ 季,一个季节或一个时代的末尾。周季,周朝末年。

㉗ 《孟子·梁惠王》篇记载:齐宣王问孟子关于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争霸之事,孟子避而不答。后来宋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孔子的门徒“羞称五霸”。

㉘ “制艺”,也称“制义”。古代按照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的文体所做的文章,叫制艺。在明、清两代,一般指八股文。

㉙ 即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

㉚ 指清朝末年官办的江南制造局(又名上海机器局),制造枪炮和修造轮船,设在上海,是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

③③ 指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

③④ 职掌,职务和职权的意思。

③⑤ 这是反语,指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名词,诬蔑中国共产党。

③⑥ 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福建的事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在上海进行抗战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进行反共内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广大官兵的推动下,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这次事变在蒋介石优势兵力压迫下,不久就失败了。

③⑦ 牛兰,当时国际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海把他夫妇两人拘捕,送往南京监禁,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加以审问。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绝食,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逮捕和审判。

③⑧ 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并坚持农民要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兴行场,日本语,即戏场。

读几本书^①

(一九三四年)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②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介绍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③，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 Symbolism 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④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⑤，中国的白璧德^⑥，中国的吉尔波丁^⑦，中国的高尔基^⑧……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

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⑨和莫泊桑^⑩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⑪和《一千一夜》^⑫是有全译的；莎士比亚^⑬，歌德^⑭，……都有全集；托尔斯泰^⑮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⑯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注 释

① 本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邓当世。后由作者编入《花边文学》。

鲁迅在本文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读书问题。他既反对了“读死书”，也批评了“反对读任何一种书”的片面论调。本文的观点

与作者前期的观点相比有明显的发展。

② 叔本华，参见《一点比喻》注③。他在《读书和书籍》一文中说过：“……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鲁迅曾在《碎话》（收《华盖集》）中引用过这句话，批判胡适之流用封建旧文化毒害青年。

③ 象征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在德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主要流派，曾流传欧洲各国，影响甚大。

④ 梅特林（一八六二——一九四九），通译梅迪林克，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

⑤ 法朗士，参见《我还不能“带住”》注⑦。

⑥ 白璧德，参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注⑭。

⑦ 吉尔波丁（一八九八——？），苏联文艺批评家，主要著作有《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等。

⑧ 高尔基，参见《为了忘却的纪念》注⑱。

⑨ 柴霍甫，通译契诃夫。参见《黑暗中国艺术界的现状》注③。

⑩ 莫泊桑（一八五〇——一八九三），法国作家，著有小说《她的一生》、《俊友》等。

⑪ 《吉诃德先生》，参阅《“连环图画”辩护》注⑬。

⑫ 《一千一夜》，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旧译《天方夜谭》。

⑬ 莎士比亚（一五六四——一六一六），通译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诗人，著有《汉姆雷特》、《奥赛罗》等。

⑭ 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德国诗人，剧作家，著有《浮士德》等。

⑮ 托尔斯泰，参见《未有天才之前》注⑤。

⑯ 陀思妥也夫斯基，参见《未有天才之前》注⑤。

拿来主义^①

(一九三四年)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②，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③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

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④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⑤。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些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⑥；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象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

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鲁迅在文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在对待文化遗产上的全盘继承、虚无主义和不敢接触等错误倾向，精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

② 《大晚报》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刊载了一条新闻，造谣说当时美术家刘海粟、徐悲鸿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并继而准备派梅兰芳前去催进。鲁迅针对这一则新闻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写了《谁在没落？》，指出象征主义已在苏联没落，斥责那种认为中国画和戏剧切合象征主义的梦话。象征主义，参见《读几本书》注③。

③ 自诩(xǔ 许), 自吹。

④ 炙(zhì 至), 烹饪法的一种。残羹冷炙, 吃剩的食物。

⑤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国民党反动派为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 与美国签定“棉麦借款”, 共五千万美元。其中一千万用来买美国小麦等, 四千万用来买美国棉花。作者在这里指的是美帝向我国“送来”的是剩余物资, 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⑥ 孱(chán 缠)头, 怯弱者。

水性^①

(一九三四年)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象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象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

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不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象发疯，或是志在“花边”^②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后由作者编入《花边文学》。

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游泳这件普通事情的论述，告诉人们要认识一个事物的性质，就需要通过实践；而只有在实践中掌握了这事物的规律，才能够对它获得自由，深刻而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理，给那些脱离实践“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周扬一伙以当头一击。

② “花边”，从前银元的边缘，铸成许多平行线的花纹，因此银元又叫“花边”。这里是讽刺周扬的同伙、反党分子廖沫沙。参阅《〈花边文学〉序言》。

趋时和复古^①

(一九三四年)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②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象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③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鸯派,骂倒王敬轩^④,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象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⑤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

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⑥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⑦的不止太炎先生^⑧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⑨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⑩，袁皇帝要严复劝进^⑪，孙传芳^⑫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⑬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⑭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康伯度。后由作者编入《花边文学》。

刘半农去世后，一些反动文人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借题发挥，攻击进步的和革命的人们。鲁迅在这篇文章里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诡

计，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刘半农的一生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又通过对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不彻底性，号召人们永远发扬战斗精神，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前进。

② 朱湘(一九〇四——一九三三)，安徽太湖人，曾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著有《草莽集》等诗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跳江自杀。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著有《海滨故人》等。一九三四年五月死于难产。

③ “趋时”，赶时髦的意思，是当时反动文人林语堂嘲讽进步人士的话。

④ 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杂志为了引起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战，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故意反对白话文，拥护封建文化，然后由刘半农复信，痛加驳斥，两信同时发表于该年三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引起强烈的反应。

⑤ 康有为，参见《我之节烈观》注⑤。

⑥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甲午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相当大的影响。

⑦ 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宋学”的对称。清初学者顾炎武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后来为清廷利用，形成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

⑧ 太炎，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名炳麟，浙江余姚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曾鼓吹并实际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钻入故纸堆中。

⑨ 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〇八)，字仲容，号籀斋，浙江瑞安人。清末经学家，文字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书。

⑩ 康有为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同张勋一起拥戴溥仪复辟。

⑪ 一九一五年，严复、杨度等所谓“六君子”，曾受袁世凯指使，组织“筹安会”，“劝进”袁称帝。

⑫ 孙传芳(一八八四——一九三五)，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六年任苏浙闽皖赣五省总司令。

⑬ 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孙传芳在南京也举行“投壶”仪式，提倡复古，原定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太炎并没有去。

⑭ 这是过去祭文中通常用来结尾的话。

门外谈^①

(一九三四年)

一 开 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

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②。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③，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④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⑤。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

二 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⑥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⑦。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

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糊糊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就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⑧，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

三 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⑨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Quippus)^⑩，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象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峒嵎碑”是道士们假造的^⑪；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⑫。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

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⑬，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艺术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

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⑭，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 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上都说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⑮，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

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宁”^⑩，有吃有住，安宁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宁”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它至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宝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象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

单,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
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
“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
“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
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
谢却只好踌躇一下了。

五 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
他口气,好象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①。不过我
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
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
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
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
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
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
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
字的司马迁^②,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
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伙颐,涉之为王沈沈
者”^③,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

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⑳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㉑和《前汉纪》^㉒记的就两样。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
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象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 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

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②③}，连做了士子^{②④}，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具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笊子；至于符^{②⑤}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象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

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Kroatia）^{②⑥}，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

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⑳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㉑,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㉒,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㉓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㉔,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㉕。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 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㉖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②4}。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②5}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②6}，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②7}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②8}，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

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 怎么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③⑨}；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④⑩}，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④⑪}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

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④②}。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④③}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④④}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象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④⑤}，《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④⑥}，就都是介绍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 Rhen，“房子”就是 Fangz，“我吃果子”是 Wo ch goz，“他是工人”是 Ta sh gungrhen。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象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 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

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④，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象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

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⑥那当然不错的，不

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十 不 必 恐 慌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⑩，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讽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

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介绍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莲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⑤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⑥，俄国的梭罗古勃^⑦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十一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

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

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⑤或《辞源》^⑥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象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十二 煞 尾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

位的高论罢。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署名华圉。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本篇曾与其他四篇文章合印成《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读经,保存文言;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戴季陶等反动头目也到处游说,提倡读经、复古。五月四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第一百一十号上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提出小学学习文言,初中读《孟子》,高中读《论语》、《大学》、《中庸》,他的同事吴研因在南京、上海各报著文表示反对。六月十八日,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提出“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的口号。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等继起补充和说明。二个月来,上海已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其中暴露了不少对文化史的错误观点和混乱思想,而胡适公然发表《大众语在哪里》一文,否定大众语存在。鲁迅为了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写了这篇重要著作。

作者在本文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论述了文字和文学的起源、群众文艺、文字改革、以及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如何向群众学习等重要问题;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驳斥了那种轻视群众文艺的贵族老爷态度,热情赞扬了人民群众创造的生动活泼、刚健清新的语言文学,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力。这是一篇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起源史和发展史。

② 蝙蝠(biān fū 边福),翼手类哺乳动物。日伏暗处,夜飞空中。《伊索寓言》上有一篇《蝙蝠与黄鼠狼》,说有一次一只与飞禽为敌的黄鼠狼

捉住它，它自称不是鸟，是兽类的老鼠；后来又被别的最恨老鼠的黄鼠狼捉住了，它便自称不是鼠，而是飞禽类的鸟。以后，人们便常以蝙蝠比喻无固定立场和见解的投机取巧者。

③ 唐宋八大家即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和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个古文家。

④ “海话”，即话。这是按上海方音的读法。带有“大话”的意思。

⑤ 庠(hù户)，汲水。庠水，用水车汲水。

⑥ 仓颉，也作“苍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过去人错误地认为汉字是他创造的。作者在文中指出仓颉“未可信”。

⑦ 《春秋演孔图》记载“仓颉四目”，传说仓颉是四只眼睛。

⑧ 升，即上；中，指成功。升中于天，指把记载自己经营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报告功绩。

⑨ 八卦，相传为伏羲所作，是八种图形。用“—”和“--”两种符号三个一组搭配而成。《易经》中以“—”为阳，以“--”为阴，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包含朴素的哲学观点的萌芽。后来，八卦成为道家宣传封建迷信的工具。

⑩ “打结字”是古代秘鲁印第安族牧民用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

⑪ 岫嵎(gǒu lǒu 苟楼)，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岫嵎碑，相传为夏禹治水时刻的。实际是道士假造的，不可信。

⑫ 甲骨文，也叫“殷虚文字”、“契文”。商殷王朝，常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卜后，又常在上面刻写卜辞以及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十九世纪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开始发掘出土。从已发掘的十余万片甲骨文看，不仅字体已由单体趋向合体，而且有了大批的形声字，所以“已经很进步了”。甲骨文是已发现的汉字中时代最古的一种。

钟鼎文，指古代一切铜器上的文字。古代铜器一般分礼器与乐器两

大类，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后来就把钟鼎作为一切古铜器的总称。

⑬ 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内，洞窟里有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一八七九年发现。

⑭ 朱育，三国吴国孙亮时人，少年好奇字，作一千多异字。《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记载有人改造天、地等十二字献给武则天。

⑮ 《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载文字构成法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六种。《说文解字》(文字学书，东汉许慎著，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列五百四十部)记载文字构成法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

⑯ 甯，“宁”的古体字。《说文》段注：“此安宁正字”。

⑰ 此处指胡适。“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文言文，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言、文是一致的，后来由于为特权者所把持，才分了家。一九二七年，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出版，书前有黎锦熙的一篇《代序》，指出这部书所以起自战国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语、文分家的时候写起。后来，胡适将此书修订，一九二八年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抽去《代序》，但全书一开始就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言下之意，仍认为战国以前言、文是一致的。

⑱ 司马迁(约公元前一四五或一三五——?)，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历史学家、文学家。公元前一〇八年，任太史令，后因事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著《史记》，这部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范例，对后来史学有很大影响。《史记》语言生动，刻划人物形象鲜明，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

⑲ 頤，助声词。沈沈，宫室深邃貌。此语见《史记·陈涉世家》。

⑳ 淮南王刘长是汉文帝刘恒的弟弟，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途中不食而死。不久民间就有《淮南王歌》这一民谣。

⑳ 《汉书》，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代历史书，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始写于班固之父班彪；彪死，班固整理补充，最后由班固之妹班昭及马续续成。作者强调帝王正统，多用古字，较为难读。

㉑ 《前汉纪》，东汉荀悦撰写的西汉编年史，三十卷，成书于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仿《左传》体例，删订《汉书》而成。

㉒ 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史馆、昭文馆、集贤馆三馆真本书籍收藏其中。

㉓ 士子，即学子，旧时读书人的通称。

㉔ 符，道士用来“驱鬼召神”或“治病延年”的一种秘密文书，是种迷信的、骗人的东西。

㉕ 克罗蒂亚，一般译为克罗地亚。以前是王国，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内的一个共和国。

㉖ 杨雄（公元前五三——后一八），西汉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他的《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刘歆，西汉著名学者，目录学家。

㉗ 樊宗师（？——约八二一），唐朝散文家，他的文章艰涩难懂，时号“涩体”。

㉘ 李贺（七九一——八一七），唐朝诗人，他的诗用语奇特，不易了解。

㉙ 《康熙字典》，字书。清代康熙年间，由清政府集中人力，在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余人主持下，依据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补修订，费时六年（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即公元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一五年）编纂而成。全书分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卷；其中分别排列二百一十四部首，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汉字。部首和每部中所收单字都以笔划多少顺序排列。每个单字下，先注音；再训释字义；再列别音别义；再列古音。一般都引古书来证释。清代法令规定，读书

人应科举考试,书写字体必须以这部书为标准。这部书的内容,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而且错讹很多。但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规模较大的字书,对学术界和以后的字典编纂有较大影响。

⑳ 钱坫(一七四四——一八〇六),清朝书法家,善写小篆。刘熙,汉末训诂学家,所著《释名》是一部训诂书。

㉑ 《说文》,即《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字体以小篆为主,有古文籀(zhòu 宙)文(即大篆)等异体。章太炎,即章炳麟,他对古汉语颇有研究,尤精小学。《小学答问》是他的一部著作。

㉒ 子游、子夏就是孔子的学生言偃、卜商。他们都擅长文学;但这句话中的“文学……”的“学”字是动词,与上一句中的“文学”意思不同。“文学”在英文里就是 Literature。

㉓ 指群众文艺。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讲的。林语堂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批评方面,近来……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鲁迅在文中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论调,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学方面的巨大创造力。

㉔ 即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

㉕ 指《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相传是荷马所作,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对于荷马的生平以及是否有过这个人,欧洲文学史家有很大争论。

㉖ 《子夜歌》和《读曲歌》,是东晋至南朝时的吴声歌曲,多用双关语。现存《子夜歌》四十二首,《读曲歌》八十九首。见《乐府诗集》。

㉗ 《竹枝词》和《柳枝词》,盛行于唐代,是文人以民歌翻新的形式,多为七言,语言通俗,音调轻快。《竹枝词》原出在四川,首先由刘禹锡作《竹枝》新词九章;《杨柳枝》原为唐代教坊(练习宫廷音乐歌舞的地方)歌曲,首先由白居易翻旧曲为新歌,作《杨柳枝词》。

㉘ 这是用“莲花落”(北方称“落子”)这种说唱形式编成的俗歌,又

称“太平歌”。清代末年，统治集团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起，废八股，设学堂，推行通俗教育；一九〇六年，学部奏颁教育会章程十五条，主张“正人心，厚风俗”，并设立宣讲所、习艺所，改良小说、戏曲，将《国民必读》和时局文件，用白话编成通俗故事和歌谣，到处宣讲。这首“太平歌”，就是当时奏准颁布的俗歌之一。

④⑩ 指清末士大夫和封建文人为配合统治集团的所谓“通俗教育运动”而办的白话报。一八九七年从上海办起，以后天津、山西、直隶（今河北）都有创办。目的是让读书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

④⑪ 劳乃宣（一八四三——一九二一），近代音韵学家，汉字改革的提倡者，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他极力主张推行简字拼音。他的《简字全谱》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写成一九〇七年。王照（一八五九——一九三三），清末的维新运动者，曾仿日本假名，取汉字偏旁和部分笔划，拟“官话字母”，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〇〇年刊行。

④⑫ 一九一三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因入声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后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注音字母”。一九三〇年改称“注音符号”。

④⑬ 日本字母因为是从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

④⑭ 赵元任是制作罗马字拼音的主要人员。这套拼音字写法有四声的区别。这套罗马拼音方案，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于一九二八年公布。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收《且介亭杂文》）中说：“赵元任的太繁，用不来的。”

④⑮ 《每日国际文选》，一种翻译刊物，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上的各种论文。《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是这文选的第二十二号。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

④⑯ 《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其每月增刊，它的第九、十号合刊上刊有《中国

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

④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吴稚晖的《大众语万岁》，文中完全否定大众语文学，并提出“文学不死，大祸不止”的荒谬口号。五日、六日《自由谈》又发表了两篇文章，单纯地为文学辩护。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文章，支持吴稚晖观点，并说大众劳作之后已经精疲力尽，“又还有什么精力去鉴赏所谓文学呢？”完全否定大众需要文学。

⑤ 活圣贤，指李焰生。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上，竭力反对汉字拉丁化和大众语。八月十五日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文章，说文言文“很具有统一性”，如果实行了拉丁化，将使原来百分之二十识字的人变得和百分之八十不识字的人一样，成为文盲。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收《且介亭杂文》）和《大雪纷飞》（收《花边文学》）中都对他作了驳斥。李焰生是反共刊物《新垒》主编，文化特务。

⑥ 当时报刊上有不少这样的论调。陶知行（即陶行知）七月四日在《自由谈》著文，提出“将生活符号普及于大众，使大众自己创造出语文合一的大众文。”吴稚晖在《大众语万岁》里引了这句话，并把它简括为“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一卷第三期里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鲁迅批判了这些观点，辩证地论述了怎样和由谁来推进文化发展的问題。

⑦ 这是文化特务李焰生文章中的话，目的在把大众语说成共产党提出的，以恐吓大众语拥护者。宋阳，即瞿秋白。他一九三二年写过论大众文艺的文章，并没有具体提出大众语问题。

⑧ 指明朝新安郑之珍所作的《目连救母记》。书前有别人写于清朝的序言，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相传目连是佛的大弟子，有大神通，曾入地狱救母。宋代有目连救母杂剧，明代郑之

珍、清代张照都写过传奇，近代地方戏曲中，也有不少与其有关的剧目。

⑤ 伊索，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寓言家。流传至今的《伊索寓言》是后人编集的。

⑥ 梭罗古勃(一八六三——一九二七)，俄国资产阶级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

⑦ 《马氏文通》，清朝马建忠著，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此书间有以拉丁语强解汉字之处。

⑧ 《辞源》，近代最早编成的一部百科全书性的辞典。商务印书馆编，一九一五年出版。分上、下两册；一九三一年又出版《续编》一册。一九三九年出《辞源正续编》合订本。收单字、词汇、成语、典故、新名词、人名地名等共七万余条。全书完全依照《康熙字典》分十二集和二百一十四部首，书后有四角号码索引。每个单字先以反切注音，并标韵部；然后再释字义。单字后，分条列举以这个字为词头的词语，一般先说明词义，再征引古书加以证明。这部书，过去较流行。

《准风月谈》后记^①

(一九三四年)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象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

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②，《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③，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④，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嘿，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

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⑤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⑥（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女 婿 问 题

如 是

最近的《自由谈》上，有两篇文章都是谈到女婿的，一篇是孙用的《满意和写不出》，一篇是苇索的《登龙术拾遗》。后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则不在手头，刊出日期大约在八月下旬。

苇索先生说：“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但女婿却

是会要上文坛的。”后一句“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立论十分牢靠，无瑕可击。我们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是人家的女婿，我们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坛上“北面”而坐的鲁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会要上文坛的”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前一句“文坛虽然不致于要招女婿”，这句话就简直站不住了。我觉得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

又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能用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佩服，因为用妻子的钱来作文学资本，总比用妻子的钱来作其他一切不正当的事情好一些。况且凡事必须有资本，文学也不能例外，如没有钱，便无从付印刷费，则杂志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办书店，出杂志，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来，妻子的钱自然也是私蓄之一。况且做一个富家的女婿并非罪恶，正如做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之并非罪恶为一样，如其一个报馆老板的亲戚，回国后游荡无事，可以依靠亲戚的牌头，夺一个副刊来编编，则一个富家的女婿，因为兴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赔嫁钱来作文学资本，当然也无不可。

“女婿”的蔓延

圣闲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妒忌的结果是攻击。

假如做了人家的女婿，是不是还可以做文人的呢？答案自然是属于正面的，正如前天如是先生在本园上他的一篇《女婿问题》里说过，今日在文坛上最有声色的鲁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不过既然做文人同时也可以做人家的女婿，则此女婿是应该属于穷岳家的呢，还是属于富岳家的呢？关于此层，似乎那些老牌作家，尚未出而主张，不知究竟应该“富倾”还是“穷倾”才对，可是《自由谈》之流的撰稿人，既经对于富岳家的女婿取攻击态度，则我们感到，好象至少做富岳家的女婿的似乎不该再跨上这个文坛了，“富岳家的女婿”和“文人”仿佛是冲突的，二者只可任择其一。

目下中国文坛似乎有这样—个现象，不必检查—个文人他本身在文坛上的努力的成绩，而唯斤斤于追究那个文人的家庭琐事，如是否有富妻子或穷妻子之类。要是你今天开了一家书店，则这家书店的本钱，是否出乎你妻子的赔嫁钱，也颇劳—些尖眼文人，来调查打听，以此或作攻击讥讽。

我想将来中国的文坛，—定还会进步到有下种情形：穿陈嘉庚橡皮鞋者，方得上文坛，如穿皮鞋，便属贵族阶级，而入于被攻击之列了。

现在外国回来的留学生失业的多得很。回国以后编—个副刊也并非—件羞耻事情，编那个副刊，是否因亲戚关系，更不成问题，亲戚的作用，本来就在—种地方。自命以扫除文坛为已任的人，如其人家偶而提到—两句自己的不愿意听的话，便要成群结队的来反攻，大可不

必。如其常常骂人家为狂吠的，则自己切不可也落入于狂吠之列。

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如是先生是凡庸的，背出了他的祖父，父亲，鲁迅，茅盾之后，结果不过说着“鲁迅拿卢布”那样的滥调；打诨^⑦的高手要推圣闲先生，他竟拉到我万想不到的诗人太太的味道上去了。戏剧上的二丑帮忙，倒使花花公子格外出丑^⑧，用的便是这样的说法，我后来也引在《“滑稽”例解》中。

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今年二月，我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做了三篇短论^⑨，是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将却以为“这回是得之矣”了。就在也是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⑩（三月三日出）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者算是只译了其中的一篇《谈监狱》，投给了《人言》，并且前有“附白”，后有“识”——

谈 监 狱

鲁 迅

（顷阅日文杂志《改造》三月号，见载有我们文坛老将鲁迅翁之杂文三篇，比较翁以中国文发表之短文，更见精彩，因译之，以寄《人言》。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于氏为憾。但请仍用翁的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译者井上附白。）

人的确是由事实的启发而获得新的觉醒，并且事情也是因此而变革的。从宋代到清朝末年，很久长的时间中，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文章，选拔及登用人才。到

同法国打了败仗，才知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遣留学生到西洋，设立武器制造局，作为改正的手段。同日本又打了败仗之后，知道这还不彀，这一回是大大地设立新式的学校。于是学生们每年大闹风潮。清朝复亡，国民党把握了政权之后，又明白了错误，而作为改正手段，是大造监狱。

国粹式的监狱，我们自古以来，各处早就有的，清朝末年也稍造了些西洋式的，就是所谓文明监狱。那是特地造来给旅行到中国来的外人看的，该与为同外人讲交际而派出去学习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囚人却托庇了得着较好的待遇，也得洗澡，有得一定分量的食品吃，所以是很幸福的地方。而且在二三星期之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便发布了囚人口粮不得刻扣的命令。此后当是益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象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所以不但禁锢人犯，而且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有时还有榨取人犯亲属的金钱使他们成为赤贫的职责。而且谁都以为这是当然的。倘使有不以为然的人，那即是帮助人犯，非受犯罪的嫌疑不可。但是文明程度很进步了，去年有官吏提倡，说人犯每年放归家中一次，给予解决性欲的机会，是很人道主义的说法。老实说：他不是他对于人犯的性欲特别同情，因为决不会实行的望头，所以特别高声说话，以见自己的是官吏。但舆论甚为沸腾起来。某批评家说，这样之后，大家见监狱将无畏惧，乐而赴之，大为为世道人心愤慨。受了圣贤之教，如此悠久，尚不象那个官吏

那么狡猾，是很使人心安，但对于人犯不可不虐待的信念，却由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想来，监狱也确有些象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的理想乡。火灾少，盗贼不进来，土匪也决不来掠夺。即使有了战事，也没有以监狱为目标而来暴击的傻瓜，起了革命，只有释放人犯的例，没有屠杀的事。这回福建独立的时候，说释人犯出外之后，那些意见不同的却有了行踪不明的谣传，但这种例子是前所未见的。总之，不象是很坏的地方。只要能容许带家眷，那么即使现在不是水灾，饥荒，战争，恐怖的时代，请求去转居的人，也决不会没有。所以虐待是必要了吧。

牛兰夫妻以宣传赤化之故，收容于南京的监狱，行了三四次的绝食，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监狱精神之故。某官吏说他自己不要吃，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很讶奇这事。不但不关系于仁政，且节省伙食，反是监狱方面有利。甘地的把戏，倘使不选择地方，就归于失败。

但是，这样近于完美的监狱，还留着一个缺点，以前对于思想上的事情，太不留意了。为补这个缺点，近来新发明有一种“反省院”的特种监狱，而施行教育。我不曾到其中去反省过，所以不详细其中的事情，总之对于人犯时时讲授三民主义，使反省他们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要做出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倘使不愿写或写不出则当然非终生反省下去不行，但做得不好，也得反省到死。在目下，进去的有，出来的也有，反省院还有新造的，总是进去

的人多些。试验完毕而出来的良民也偶有会到的，可是大抵总是萎缩枯槁的样子，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面把心力用尽了。那是属于前途无望的。

（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编者先生认为可用，当再译寄。——译者识。）

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但文字也原是无须译得认真的，因为要紧的是后面的算是编者的回答——

编者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治治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

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丸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⑪是怎样的阴险了。他们的主公邵诗人，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语的圈子。”^⑫（《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

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语的圈子”去了。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

但这种鹰犬的这面目，也不过以向“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我而已，只要立刻能给一个嘴巴，他们就好比吧儿狗还驯服。现在就引一个也曾在《“滑稽”例解》中提过，登在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申报》上的广告在这里罢——

“十日谈”向“晶报”声明误会表示歉意

敬启者十日谈第二期短评有朱霁青亦将公布捐款一文后段提及晶报系属误会本刊措词不善致使晶报对邵洵美君提起刑事自诉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兹经章士钊江容平衡诸君诠释已得晶报完全谅解除由晶报自行撤回诉讼外特此登报声明表示歉意

“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此“理”极奇，大约是应该攻讦“最近是在查禁之列”的刊物的罢。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在这里看见铁证了。

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跳到别一件，这就是《庄子》和《文选》^⑬。

这案件的往复的文字，已经收在本文里，不再多谈；别人的议论，也为了节省纸张，都不剪帖了。其时《十日谈》也大显手段，连漫画家都出了马，为了一幅陈静生先生的“鲁迅翁之笛”，还在《涛声》上和曹聚仁先生惹起过一点辩论的小风波^⑭。但是辩论还没有完，《涛声》已被禁止了，福人总永远有福星照命……

然而时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谓“第三种人”，尤其是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

这回要提到末一篇，流弊是出在用新典。

听说，现在是连用古典有时也要被检查官禁止了，例如提起秦始皇，但去年还不妨，不过用新典总要闹些小乱子。我那最末的《青年与老子》^⑮，就因为碰着了杨邨人先生，（虽然刊出的时候，那名字已给编辑先生删掉了），后来在《申报》本埠增刊的《谈言》（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引得一篇妙文的。不过颇难解，好象是在说我以孝子自居，却攻击他做孝子，既“投井”，又“下石”了。因为这是一篇我们的“改悔的革命家”的标本作品，弃之可惜，谨录全文，一面以见杨先生倒是现代“语录体”^⑯作家的先驱，也算是我的《后记》里的一点余兴罢——

聪明之道

邨人

畴昔之夜，拜访世故老人于其庐：庐为三层之楼，面街而立，虽电车玲玲轧轧，汽车呜呜哑哑，市嚣扰人而不觉，俨然有如隐士，居处晏如，悟道深也。老人曰，“汝来何事？”对曰，“敢问聪明之道。”谈话有主题，逐成问答。

“难矣哉，聪明之道也！孔门贤人如颜回，举一隅以三隅反，孔子称其聪明过人，于今之世能举一隅以三隅反者尚非聪明之人，汝问聪明之道，其有意难余老瞶者耶？”

“不是不是，你老人家误会了我的问意了！我并非要请教关于思辨之术。我是生性拙直愚笨，处世无方，常常碰壁，敢问关于处世的聪明之道。”

“噫嘻，汝诚拙直愚笨也，又问处世之道！夫今之世，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阶级不同，思想各异，父子兄弟夫妇姊妹因思想之各异，一家之内各有主张各有成见，虽属骨肉至亲，乖离冲突，背道而驰；古之所谓英雄豪杰，各事其君而为仇敌，今之所谓志士革命家，各为阶级反目无情，甚至只因立场之不同，骨肉至亲格杀无赦，投机取巧或能胜利于一时，终难立足于世界，聪明之道实则已穷，且唯既愚且鲁之徒方能享福无边也矣。……”

“老先生虽然说的头头是道，理由充足，可是，真的聪明之道就没有了吗？”

“然则仅有投机取巧之道也矣。试为汝言之：夫投机取巧之道要在乎滑头，而滑头已成为专门之学问，西欧学理分门别类有所谓科学哲学者，滑头之学问实可称为滑头学。滑头学如依大学教授之编讲义，大可分成若干章，每章分成若干节，每节分成若干项，引古据今，中西合璧，其理论之深奥有甚于哲学，其引证之广大举凡中外历史，物理化学，艺术文学，经商贸易之直，诱惑欺骗之术，概属必列，包罗万象，自大学预科以至大学四年级此一讲义仅能讲其千分之一，大学毕业各科及格，此滑头学则无论何种聪明绝顶之学生皆不能及格，且大学教授本人恐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难学也可想而知之矣。余处世数十年，头顶已秃，须发已白，阅历不为不广，教训不为不多，然而余着手编辑滑头学讲义，仅能编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也。此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一项其纲目为‘顺水行舟’，即人云亦云，亦即人之喜者喜之，人之恶者恶之是也，举一例言之，如人之恶者为孝子，

所谓封建宗法社会之礼教遗孽之一，则汝虽曾经为父侍汤服药问医求卜出诸天性以事亲人，然论世之出诸天性以事亲人者则引‘孝子’之名以责难之，惟求青年之鼓掌称快，勿管本心见解及自己行动之如何也。被责难者处于时势潮流之下，百辞莫辩，辩则反动更为证实，从此青年鸣鼓而攻，体无完肤，汝之胜利不但已操左券，且为青年奉为至圣大贤，小品之集有此一篇，风行海内洛阳纸贵，于是名利双收，富贵无边矣。其第一章之第一节，第一节之第二项为‘投井下石’，余本亦知一二，然偶一忆及投井下石之人，殊觉头痛，实无心编之也。然而滑头学虽属聪明之道，实乃左道旁门，汝实不足学也。”

“老先生所言想亦很有道理，现在社会上将这种学问作敲门砖混饭吃的人实在不少，他们也实在到处逢源，名利双收，可是我是一个拙直愚笨的人，恐怕就要学也学不了吧？”

“呜呼汝求聪明之道，而不学之，虽属可取，然碰壁也宜矣！”

是夕问道于世故老人，归来依然故我，呜呼噫嘻！

但我们也不要一味赏鉴“呜呼噫嘻”，因为这之前，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也还是剪报好，我在这里剪一点记的最为简单的——

艺华影片公司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金司徒庙附近新建之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该公司

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在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遂大呼一声，则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处，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摄影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约逾七分钟时，由一人狂吹警笛一声，众暴徒即集合列队而去，迨该管六区闻警派警士侦缉员等赶至，均已远扬无踪。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于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云。

据各报所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者，但以向南京检委会行贿，故得通过发行。又称该会现向教育部，内政部，中央党部及本市政府发出呈文，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业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对受贿之电影检委会之责任人员，予以惩处等语。

事后，公司坚称，实系被劫，并称已向曹家渡六区公安局报告。记者得讯，前往调查时，亦仅见该公司内部布置被毁无余，桌椅东倒西歪，零乱不堪，内幕究竟如何，想

不日定能水落石出也。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报》。

影界铲共会

警戒电影院

拒演田汉等之影片

自从艺华公司被击以后，上海电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动，从制片商已经牵涉到电影院，昨日本埠大小电影院同时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之警告函件，请各院拒映田汉等编制导演主演之剧本，其原文云：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电影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影片公司之行动，查贵院平日对于电影业，素所热心，为特严重警告，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此告。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

但“铲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时遭到复面英雄们的袭击了。又剪报——

今晨良友图书公司

突来一怪客

手持铁锤击碎玻璃窗
扬长而去捕房侦查中
▶……光华书局请求保护

沪西康脑脱路艺华影片公司, 昨晨九时许, 忽被状似工人等数十名, 闯入摄影场中, 并大发各种传单, 署名“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等字样, 事后扬长而去。不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今日上午十一时许, 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忽有一男子手持铁锤, 至该公司门口, 将铁锤击入该店门市大玻璃窗内, 击成一洞。该男子见目的已达, 立即逃避。该管虹口捕房据报后, 立即派员前往调查一过, 查得良友公司经营各种思想左倾之书籍, 与捣毁艺华公司一案, 不无关联。今日上午四马路光华书局据报后, 惊骇异常, 即自投该管中央捕房, 请求设法保护, 而免意外, 惟至记者截稿时尚未闻发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报》。

捣毁中国论坛

印刷所已被捣毁
编辑间未受损失

承印美人伊罗生编辑之《中国论坛报》勒佛尔印刷所, 在虹口天潼路, 昨晚有暴徒潜入, 将印刷间捣毁, 其编辑间则未受损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报》。

袭击神州国光社

昨夕七时四人冲入总发行所
铁锤挥击打碎橱窗损失不大

河南路五马路口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于昨晚七时，正欲打烊时，突有一身衣长袍之顾客入内，状欲购买书籍。不料在该客甫入门后，背后即有三人尾随而进。该长袍客回头见三人进来，遂即上前将该书局之左面走廊旁墙壁上所挂之电话机摘断。而同时三短衣者即实行捣毁，用铁锤乱挥，而长衣者亦加入动手，致将该店之左橱窗打碎，四人即扬长而逸。而该店时有三四伙友及学徒，亦惊不能作声。然长衣者方出门至相距不数十步之泗泾路口，为站岗巡捕所拘，盖此长衣客因打橱窗时玻璃倒下，伤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该长衣者当即被拘入四马路中央巡捕房后，竭力否认参加捣毁，故巡捕已将此人释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报》。

美国人办的报馆捣毁得最客气，武官们开的书店捣毁得最迟^①。“扬长而逸”，写得最有趣。

捣毁电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几种报上登过全文；对于书店和报馆却好象并无议论，因为不见有什么记载。然而也有，是一种钢笔版蓝色印的警告，店名或馆名空着，各各填以墨笔，笔迹并不象读书人，下面是一长条紫色的木印。我幸而藏着原本，现在订定标点，照样的抄录在这里——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计，拟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

贵……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此告

.....

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 十一，十三。

一个“志士”，纵使“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是也许要灰心的。然则书店和报馆之有些为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既是被“扬长而去”的英雄们指定为“赤色作家”，还是莫害他人，放下笔，静静的看一会把戏罢，所以这一本里面的杂文，以十一月七日止，因为从七日到恭逢警告的那时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并没有写些什么的。

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土披离纯”^⑮，何况现在嗅觉又特别发达了，他们深知道要怎样“创作”才合式。这

就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而我的工作只是收材料。材料尽有，妙的却不多。纸墨更该爱惜，这里仅选了六篇。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未免非常昏愤；《大晚报》和《大美晚报》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聪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迟钝，他刚才决计合伙来讨伐，却不料几天之后就要过年，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

现在算是还没有过年，先来《中央日报》的两篇罢——

杂 感 洲

近来有许多杂志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报月刊》《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象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

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象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象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文坛与擂台

鸣春

上海的文坛变成了擂台。鲁迅先生是这擂台上的霸王。鲁迅先生好象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

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Q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

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积，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愤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象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 B. A. Vassiliev 对鲁迅先生的《阿 Q 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 Q 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

文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州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①⑨}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②⑩}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中间就夹两篇《时事新报》上的文章——

略 论 告 密

陈 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说是鲁迅先生，就在《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记》与《后记》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这一点。可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处，或者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么要他的“密”的别的机关？）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为”他“旧日的

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的什么宣说出来，而使人知道“什么就是鲁迅”。

“这回，”鲁迅先生说，“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他却忘了说编者暗示于鲁迅先生尚未上场之先。因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时候，编者先介绍说，这将上场的两位是文坛老将。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来等那两位文坛老将的上场。要是在异地，或者说换过一个局面，鲁迅先生是也许会说编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个生疏的名字在什么附刊上出现，就想知道那个名字是真名呢，还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笔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鲁迅先生说，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艺》，便禁不住问：“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谁的笔名的话，他也许会说出那就是谁来的。这不会是怎样的诬蔑，我相信，因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实说“柳丝是杨村人先生……的笔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还有，要是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象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前日读了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弢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展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他是会说我自己乃是“最后的凶手”的。

他还问：要是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答曰：这确是比较的难懂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要告得象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进探坛^②里去了。有意的和无意的的区别，我是知道的。我所谓告密，是指着叭儿们，我看这陈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灵，不是反而不便当么？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弢先生为就是我了。采在这里，只不过充充自以为我的论敌的标本的一种而已。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报》上的东西——

钱基博之鲁迅论

威施

近人有哀集关于批评鲁迅之文字而为《鲁迅论》一书

者，其中所收，类皆称颂鲁迅之辞，其实论鲁迅之文者，有毁有誉，毁誉互见，乃得其真。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警。迩来旧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尝注意及之。兹特介绍其“鲁迅论”于此，是亦文坛上之趣闻也。

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此于鲁迅之直译外国文学，及其文坛之影响，而加以訾警者也。平心论之，鲁迅之译品，诚有难读之处，直译当否是一问题，欧化的国语文学又是一问题，借曰二者胥有未当，谁尸其咎，亦难言之也。钱先生而谓，鄙言为不然耶？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

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是则于鲁迅之创作亦加以訾警，兼及其思想矣。至目鲁迅为右倾，亦可谓独具只眼，别有鉴裁者也！既不满意于郭沫若蒋光赤之左倾，又不满意于鲁迅徐志摩之右倾，而惟倾慕于所谓“让清”遗老之流风余韵，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己，钱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当今之世，左右做人难，是非无定质，亦于钱先生之论鲁迅见之也！

钱氏此书出版于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记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报》的《火炬》。

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最后是《大美晚报》，出台的又是曾经有过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骂人与自供

王平陵

学问之事，很不容易说，一般通材硕儒每不屑与后生小子道长论短，有所述作，无不讥为“浅薄无聊”；同样，较有修养的年轻人，看着那般通材硕儒们言必称苏俄，文必宗普鲁，亦颇觉得如嚼青梅，齿颊间酸不可耐。

世界上无论什么纷争,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类思想的冲突,因为多半是近于意气,断没有终止的时候的。有些人好象把毁谤人家故意找寻人家的错误当作是一种职业;而以直接否认一切就算是间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只许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准过问的。其实,有时候这些人意在对人而发的阴险的暗示,倒并不适切;而正是他们自己的一篇不自觉的供状。

圣经里好象有这样一段传说:一群街头人捉着一个偷汉的淫妇,大家要把石块打死她。耶稣说:“你们反省着!只有没有犯过罪的人,才配打死这个淫妇。”群众都羞愧地走开了。今之文坛,可不是这样?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如同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骂人是代表官方说话;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么“方”说话!

本来,不想说话的人,是无话可说;有话要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鲁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了。

象这样的情形,文坛有的是,何止是鲁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报》的《火树》。

记得在《伪自由书》里,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论为属于“官方”^②,这回就是对此而发的,但意义却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的话看起来,好象是说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么,说人反动的,他自己正是反动,说人匪

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评语”了，耶稣不说过“你们反省着”吗？——为消灾计，再添一条小尾：这坏习气只以文坛为限，与官方无干。

王平陵先生是电影检查会的委员，我应该谨守小民的规矩。

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②③}，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②④}，藏真实兮心曲，立降旛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这《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在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还是真的带住罢，写到我的背脊已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

注 释

① 《准风月谈》是鲁迅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所作的杂文集，共六十四篇。初版在一九三四年出版。本文是这个杂文集出版时写的后记。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是反革命文化“围剿”空前残酷的时期。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特务打手倾巢出动，用文、武两手对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镇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申报·自由谈》的编者被迫发表“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但是，鲁迅并没有被吓倒，他变换使用多种笔名，继续在《自由谈》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許多犀利的战斗杂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准风月谈》这个杂文集的名字同《伪自由书》一样，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讽刺和反击。在这篇“后记”中，鲁迅详细介绍了当时文化战线上斗争的过程，特别集中地驳斥了反动文人和叛徒、特务对他的战斗杂文的攻击。

② 《序的解放》和后面提到的《豪语的折扣》、《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都是鲁迅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后都收入《准风月谈》。

③ 张资平曾发表启事，自称“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参见《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在《豪语的折扣》一文中引了这句话进行批判。

④ 邵洵美，反动“诗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唯美主义文艺；后加入“新月社”，任新月书店经理；以后又成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走卒。《十日谈》，邵洵美办的一种反动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创刊，旬刊，内容多是攻击鲁迅以及黄色、庸俗的文字。

⑤ “盛宣怀”，指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时，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各帝国主义妥协，订立所谓东南中外

互保条款；盛宣怀因参与此事“有功”，事后清政府授他以“太子少保”的官衔。他曾开办许多工厂，并在长江沿岸大量购买田产。盛宣怀死时，其家曾经大摆排场，举行过轰动一时的“大出丧”。

⑥ 《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反动报纸。

⑦ 打诨(hùn 混)，旧戏曲中丑角用诙谐语句逗趣的穿插。

⑧ 参见《“二丑”艺术》。

⑨ 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参见该文及有关注释。

⑩ 《人言》，周刊，郭明编辑，一九三四年二月创刊，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邵洵美、章克标都是该刊的“编辑同人”。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的一封信中提到“章(克标)编《人言》”的事，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

章克标，浙江海宁人。反动文人，曾写《文坛登龙术》一书，以轻浮的态度叙述一些文人投机取巧的手段；对鲁迅和进步文艺工作者不断进行诬蔑、诋毁和攻击。

⑪ 指明朝宦官魏忠贤专权时，一些奉承阿谀之徒。

⑫ 见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载《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现代美国文学专号》。

⑬ 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回答《大晚报》“要介绍给青年的书”的问题时，推荐了《庄子》和《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十月一日，鲁迅写了《重三感旧》一文，不指名地对他进行了批判。施蛰存接着写了《〈庄子〉与〈文选〉》、《推荐者的立场》等文进行反扑。鲁迅接连写了《“感旧”以后》（上、下）、《扑空》、《答“兼示”》等文章，揭露了施蛰存妄图引诱青年脱离现实的反动政治目的，和“洋场恶少”的丑恶面目。

⑭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八期，在章克标编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刊登了阿静（陈静生）写的《毋宁说不是崇拜鲁迅翁》一文，并附一漫画《鲁迅翁之笛》，画鲁迅吹笛而行，背后群鼠摇旗而拜，一只大袋鼠摇一铃，上挂写有“指导大纲”的一纸签。曹聚仁在《涛

声》二卷四十三期上著文予以批驳，《十日谈》第十一期上，阿静又写了《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继续对鲁迅和“左联”进行攻击。

⑮ 《青年与老子》，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在此文中，鲁迅揭露了杨邨人以“孝子”为名叛变革命的无耻行径。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⑯ 指林语堂之流在《论语》等刊物上提倡的摹仿明人小品的“语录体”文字。

⑰ 指上海神州国光社。该社一九三一年后曾接受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投资。

⑱ 英语“灵感”的音译。

⑲ 指鸣春的《文坛与擂台》和林希隽的《杂文与杂文家》等文字。林希隽，当时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曾写文章恶毒攻击鲁迅的杂文。

⑳ 托尔斯泰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时，曾写信给沙皇和日本天皇，指责他们发动战争的罪恶。又，托尔斯泰在著作中曾猛烈抨击过教会，一九〇一年二月被教会正式除名。

㉑ 探坛，指特务暗探，相对“文坛”而言的讽刺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叭儿们还要披着“文学家”的外衣搞特务活动。

㉒ 王平陵曾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在《武汉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最通的”文艺》一文，攻击鲁迅的杂文“装腔作势，吞吞吐吐”。鲁迅在编《伪自由书》时收进这篇文章，并写了《官话而已》，指出王平陵“是属于‘官方’的”。

㉓ 原语见《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即童子、小子。阮籍是反对刘邦的。他这句话的原意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的英雄，所以让刘邦这种人成了大名。鲁迅引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杂文，赋予了它极为深刻的政治含意：把自己的杂文看成时代的产物，斗争的武器；在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不是潜心于鸿篇巨制，而是用杂文为武器对有

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和抗争。鲁迅的这些杂文翻卷着时代的风云，闪耀着战斗的光芒。敌人对他的杂文的攻击，正说明了这些杂文的巨大力量。鲁迅的杂文，是一个时代的斗争的记录。鲁迅引用阮籍这句话，不仅表现了他的谦虚，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他面对敌人“围剿”的坚定立场，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一光辉真理。

②④ 谣啄(zhuó 啄)，谣言。中权，古代军队中制订谋略、发号施令的中军。这里指反动文人使用的造谣等阴谋手段。

随便翻翻^①

(一九三四年)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②,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③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④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

“国学”^⑤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糊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糊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糊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⑥，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⑦，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⑧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先生的《不得已》^⑨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

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⑩。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⑪，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

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⑫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⑬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在本文中，鲁迅从读书要广泛谈起，总结了识破骗子的骗术的经验，引导人们去“识得真金”——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指出，不要怕接触反面的东西，要进行比较，因为“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② 《鉴略》，清王仕云著，是过去启蒙用的一种历史读物。

③ 描红格即描红纸，供初学儿童习字之用，纸上印有红色楷字，然

后用墨笔描上去。对字即对课，旧时私塾教学生学习词句和准备作诗的一种方法，如“天”对“地”，“日”对“月”等。

④《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清永瑢、纪昀主编，是清朝乾隆时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一七八一年。《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是《总目》的简编本。

⑤“国学”，指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

⑥“食菜事魔”，是宋代地主阶级诬蔑当时农民起义经常利用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的称呼。因为明教不事鬼神，供奉摩尼，不吃荤。

⑦“十彪五虎”，应作“五虎五彪”。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

⑧扶乩(jī 基)，旧时迷信者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由两人扶一丁字形木架在沙盘上，胡说神降时执木架划字能为人治病、预卜吉凶等。

⑨《不得已》，清杨光先著。杨光先在康熙时曾接替德国天主教徒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台长），复用旧历。一六六八年因推闰失实下狱。《不得已》是杨为批判汤若望而写的一部书。

⑩“我大清”，是当时很流行的开蒙读本《三字经》中的句子。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国后，一般汉族官吏仍称清政府为“我大清”。鲁迅此处是用的讽刺语。

⑪ 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

⑫ 蟊，蟆的异体字。虾蟆，即虾蟆。

⑬《世界史教程》，俄国波查洛夫等著，第一本是《封建社会史》，中译本于一九三四年出版，许仑音等译。《中国社会史》，原名《中国史纲》，俄国沙发洛夫著，中译本改名为《中国社会发展史》，于一九三二年出版，李俚人译。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①

(一九三四年)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象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②。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

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们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

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③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鞑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④。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⑤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鞑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鞑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

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⑥，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⑦，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

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⑧。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术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⑨。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时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Gorky)，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绥拉斐摩维支(Serafimovich)，辛克莱(Upton Sinclair)，甚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罗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⑩。

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⑪。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⑫，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⑬。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

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象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Friche)^④,卢那卡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消沈,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 释

① 本篇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未曾在国内刊物刊载过。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日趋猖

獠，到一九三四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凶残地步。在这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鲁迅不顾敌人的威胁和迫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在这篇文章中，向全世界揭露了中国文坛上鬼魅(mèi 妹)横行的现状，痛斥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② 这是关于汉朝淮南王刘安的传说。

③ 这是汉朝人陆贾的话，见《史记·陆贾传》。大意是：汉高祖刘邦不理解文化教育的作用，曾经责骂陆贾说：“我是靠武力得到天下的，你尽弄那些诗书干什么？”陆贾反问他：“靠武力得天下，难道能够只靠武力治理吗？”

④ 参见《“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⑤ 可汗(kè hán 克含)，古代鲜卑、突厥、蒙古等民族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里指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

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爱国学生为了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陆续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出兵抗日。国民党反动派竟于十二月十四日由教育部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后来又在十七日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学生。

⑦ 一九三二年，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曾经提出“反对干涉主义”的反动口号，鼓吹文学的目的是完成“对人生永久的任务”，反对“某种政治势力的干涉”。实际是妄图以这种虚伪的口号来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⑧ 一九三二年，苏汶之流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霸占”了文坛，左翼批评家“凶暴”，致使“第三种人”“不敢动笔”。

⑨ 参见《〈准风月谈〉后记》。

⑩ 斐定，通译费定，苏联小说家。

斯忒林培克(一八四九——一九一二)，瑞典作家。

⑪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鲁迅在致姚克信里揭露说：“前几天，这里的官和出版家及书店编辑，开了一个宴会，先由官训示应该不出反动

书籍，次又由施蛰存说出仿检查新闻例，先检杂志稿，次由赵景深补足可仿日本例，加以删改，或用××代之。他们也知道禁绝左倾刊物，书店只好关门，所以左翼作家的东西，还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渔利。”这种书报检查制度，比直接动用武力更狡猾，更阴险，所以说“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施蛰存，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当时自称“第三种人”，任《现代》杂志的主编。赵景深曾任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的编辑。

⑫ 指国民党反动派伪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会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成立，比鲁迅所说的“七月”稍早。

⑬ 指从“第三种人”变为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检查官(文化特务)的苏汶、穆时英之流。

⑭ 弗理契(一八七〇——一九二九)，苏联机械唯物论的文艺批评家，著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欧洲文学发达史》等书。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①

(一九三五年)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②，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的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面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象连形象也成为褻渎，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想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③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④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⑤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

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⑥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⑦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⑧，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⑨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

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到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⑩；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⑪，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

由与？”^⑫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⑬，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⑭。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⑮，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

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⑥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⑦，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

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⑧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⑨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⑩。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象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一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中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杂文》月刊第二期，题为《孔夫子在现代中国》。后由作者略加修改，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三十年代中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侵略目的，在东京等地修建孔庙，鼓吹用“孔子之教”建立“东亚新秩序”。蒋介石集团也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下令尊孔，定八月二十七日为孔诞纪念日，大力宣扬“孔孟之道”，与日寇遥相呼应。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信中曾提及此事：“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

本文是鲁迅的一篇犀利的讨孔檄文。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深刻剖析了孔子的阶级本质，揭露了反动统治者把孔子树为偶像的政治目的，指出利用孔子做为“敲门砖”的国内外反动派逃不脱必然灭亡的命运。

② 汤岛圣堂在东京，是江户幕府时盖的日本最大的孔子庙。一九二三年烧毁，一九三二年由天皇资助重建，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落成；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和蒋介石集团代表都去“参拜”过。

③ 勃兰特，易卜生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全部，或全无”，是勃兰特说的一句台词。

④ 《孔子家语》一书，今本十卷。相传为三国魏国王肃收集和伪造。

⑤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清末与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清议报》(创刊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停刊)，是梁启超逃亡日本时在横滨发行的一种鼓吹“保皇反后”(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的旬刊。

⑥ 唐朝政府曾在开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加谥孔子为文宣王；后来宋、元、明各朝也都加过谥；到了清朝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又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⑦ 帑(tǎng 倘), 国库所藏的金帛。

⑧ 侯失勒(一七九二——一八七一), 英国天文学家。雷侠儿(一七九七——一八七五), 英国地质学家。代那(一八一三——一八九五), 美国地质学家。

⑨ 徐桐, 清末顽固派官僚, 光绪年间官至大学士, 反对维新变法, 主张利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 一九〇〇年自缢死。

⑩ 当时弘文学院的掌院为嘉纳治五郎, 学监为大久保高明。

⑪ 语见《孟子·万章》篇。

⑫ 语见《论语·公冶长》篇。桴(fú 扶), 竹箒或木筏。由, 孔子的弟子仲由。

⑬ 见《左传》哀公十五年所记。

⑭ 《孔子家语·子贡问》篇载此事。

⑮ 语见《孟子·滕文公》篇。

⑯ 张宗昌, 山东掖县人, 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任山东督军时, 曾提倡尊孔, 祭孔时行跪拜礼。

⑰ 指《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十三部儒家经典。

⑱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所作的“独幕悲喜剧”, 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此剧在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大礼堂排演后, 曾引起过一场大纠纷。纠纷始末可参见鲁迅《集外集拾遗·关于〈子见南子〉》。

⑲ 释迦牟尼(约公元前五六五——前四八六), 佛教创始人。苏格拉第(约公元前四六九——前三九九), 古代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思想代表者, 因有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活动的罪嫌, 被判处死刑。

⑳ 语见《礼记·曲礼》。

名人和名言^①

(一九三五年)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②，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③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④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

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⑤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⑥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惇’，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哪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⑦。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

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介绍医生，说他“术擅岐黄”^⑧，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⑨。……

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Virchow)^⑩，是医学界的泰斗^⑪，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Haeckel)^⑫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介绍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⑬，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⑭，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⑮，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⑯，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

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①，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②之论也。

七月一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越丁。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本文是针对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名流”，倚专家之名，行蒙骗之实这种恶劣倾向而写的。鲁迅以事实说明，这些所谓“学者”“名流”的话，不一定就是名言，其中不少恰恰是十足的谬误；相反，“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作者还谆谆告诫人们：必须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对于那些妄以“名言”自许的人，应提高警惕。

② 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它开头说：“保守文言过去有过两道策……直到最近，才由章太炎提出白话比文言还要难做的话头来，勉强算是缴了第三道。”鲁迅下文所引章太炎的话：“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

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见章太炎星期讲演会稿《白话与文言之关系》。南山的这篇文章《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也曾转引过。

③ 小学，我国汉朝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那时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小学的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④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参看《门外文谈》注⑫。

⑤ 悖(bèi 背)，荒谬、错误。

⑥ 江亢虎，江西上饶人，辛亥革命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又担任敌伪政府的考试院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上海发起“存文会”，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这里说“谈到小学”，就是一九三五年三月间他在上海“讲学”时说的话。

⑦ 惠，“德”字的古字。上半之“直”在这里应作正直、公正解，而不作曲直的直解。

⑧ 岐黄，即黄帝和岐伯，我国战国时期的著名医书《黄帝内经·素问》部分，是用黄帝和岐伯的问答形式写成的，故后来通常把那些擅长医术的人称为岐黄。

⑨ 六法，中国古代评画的六项标准。原出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此书说：“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⑩ 维尔晓(一八二一——一九〇二)，德国病理学家。在生物学上，他主张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他采取了活力的机械观，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著作有《细胞病理学》等。

⑪ 泰斗，即泰山北斗的简称，此处指有名望的人。

⑫ 赫克尔(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德国博物学家、哲学家。他根据动物形态学和胚胎学的研究成果，为生物进化提供了有力证据。他是达尔文主义的传播者，在自然观上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但社会观上是唯心主义者，他把达尔文生存竞争的学说用到社会领域，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传播者。

⑬ 法布耳(一八二三——一九一五), 法国昆虫学家。他的《昆虫记》是一部以生动活泼的文字记述昆虫生活的书; 在当时有几个中文节译本, 如《法布尔科学故事》、《昆虫故事》、《昆虫记》等。

⑭ 高头讲章, 是一种讲解经书的书, 这种书的天头留得较宽, 可以附印评语或讲解的文字。

⑮ 封建科举制度指考中进士为登第。

⑯ 下面加点的这几句话, 是刊载时被删去的。

⑰ 一九三三年前后, 章太炎曾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学会, 讲授国学。

⑱ 刊, 磨灭; 悬诸日月而不刊, 全句意思是: 象挂在日月上一样, 永远不会磨灭。语出汉朝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在这封信里, 引用张伯松赞美他的《方言》稿本的话说: “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

《花边文学》序言^①

(一九三五年)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②，小品文半月刊《太白》^③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④，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⑤。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

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⑥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⑦，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⑧，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象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⑨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

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傻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衍推宕^⑩，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⑪。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⑫。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注 释

① 《花边文学》是鲁迅一九三四年所写的杂文集，共六十一篇，最初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本篇是出版时鲁迅所写的序言。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倒提》一文之后，“四条汉子”的同伙、反党分子廖沫沙化名林默，在七月三日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花边文学”》的文章，对鲁迅进行恶毒攻击。鲁迅在这篇《序言》中痛斥了“四条汉子”一伙的阴谋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罪恶，并尖锐地指出，这种法西斯镇压政策是为日寇的侵略效劳的。

② 《中华日报》是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的报纸，其副刊《动向》创刊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同年十二月停刊。《动向》的编者为了装潢门面，招揽读者，曾向不少进步作家约稿。

③ 《太白》，陈望道主编的文艺半月刊，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④ 参见《水性》注②。

⑤ 廖沫沙化名林默写的《论“花边文学”》中攻击鲁迅说：“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的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

⑥ 文公直，国民党反动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鲁迅在《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一文后，他在当天就写了一封公开信，诬蔑鲁迅是“汉奸”；鲁迅写了一封回信，公开驳斥了他。两文同时发表在八月七日《自由谈》。

⑦ 一九三五年六月，《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了一篇易水（艾寒松）写的杂文《闲话皇帝》，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有涉及日本天皇之处。日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

党反动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封闭《新生》、惩办其主编、正式道歉等四项无理条件。国民党反动政府全部接受，立刻查封《新生》周刊，并由伪高二分院刑庭判决主编杜重远一年另两个月徒刑。

⑧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印刷前审稿，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由文化特务项德言、朱子爽、张增、展鹏天、刘民臬、陈文煦、王修德等七人为审查委员。“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根据日本要求，以“失责”为名，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将此七人撤职。

⑨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宋末抗击元朝军队的丞相，后被元军捉住，坚持不降，被杀。

⑩ 宕(dàng 荡)，意思是搁置起来不解决。敷衍推宕，即拖延搁置。

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五省是冀、鲁、晋、察、绥。

⑫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袭击沈阳。这时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军队接受了蒋匪的“绝对不得抵抗”的命令，撤到山海关以南，东北三省失陷。东北三省是辽宁、吉林、黑龙江。

《且介亭杂文》序言^①

(一九三五年)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②。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

之说教者”^③，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砾，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注 释

① 《且介亭杂文》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共收入作品三十六篇，其中除两篇作于一九三五年初外，都是一九三四年写的。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且介，半租界之意。鲁迅居住的山阴路大陆新村，当时属租界当局越界筑路的区域。

本文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辩证观点，正确地说明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作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精辟地阐述了杂文对于革命斗争的战斗作用，并对当时那些攻击鲁迅杂文、讥笑鲁迅为“杂感家”的国民党反动文人，作了有力的痛击。

② 邵洵美，参见《〈准风月谈〉后记》注④。林希隽，当时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曾在一九三四年发表《杂文与杂文家》等文，攻击鲁迅的杂文为“粗制滥造”，胡说写杂文是“作家毁掉了自己”等。

③ 这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中的一句话。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①

(一九三六年)

一 来 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 Reds 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 Reds 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

陈×× 六月三日。

二 回 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②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

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③。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④，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
大安。

鲁迅。 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O. V. ^⑤ 笔写。）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的《文学丛报》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周扬、夏衍一伙的《光明》、《文学界》都拒绝刊登。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当时在重病之中。当他看到托派对中国共产党猖狂攻击时，立刻著此文反击，揭露了托派的卖国贼嘴脸，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表达了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的感情。

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鲁迅这封信发表后，托派气急败坏，猖狂反扑。七月四日，陈仲山又写了一封长达十一页稿纸、洋洋四千二百多字的信给鲁迅，一面为托派的反动谬论进行无力的狡辩，一面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进行放肆的谩骂。他还对鲁迅进行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并要挟鲁迅将此信以《“托洛斯基派”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为题发表。鲁迅未予理睬，只在七月七日的日记中记了一句：“得陈仲山信，托洛斯基派也。”

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原是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形成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后来变为国际性的反革命组织。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又称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受到清算，但他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反动立场，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鼓吹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斗争，等待将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取消中国革命。当时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主要有：陈独秀、彭述之的“无产者社”（出刊物《无产者》）；刘仁静的“十月社”（出刊物《十月》）；黄元鸣的“斗争社”（出刊物《斗争》）。一九二九年，陈独秀将几个托派组织拼凑为“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反革命小集团，出版机关刊物《火花》。“九·一八”事变以后，陈独秀一伙接受托洛茨基“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暗中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津贴，从事卖国活动。托派“来信”中的 Reds，英语“红军”的意思；“康缪尼斯脱”，英语“共产党人”的音译，指中国共产党。

② 一八九七年，托洛茨基因参加“南俄秘密协会”，曾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本篇所说的“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即指此事。

③ 周扬一伙在鼓吹“国防文学”受到鲁迅抵制时，攻击鲁迅是“左的宗派主义者”、“托派”等等。

④ 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

⑤ O. V. 即冯雪峰。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①

——病中答访问者，O. V. 笔录——

(一九三六年)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漫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

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②，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混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

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六月十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一九三六年春，周扬一伙根据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抹煞阶级矛盾，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鲁迅则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根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同周扬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本文是在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一天作的。在本文中，鲁迅正式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这个口号的性质和内容，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阶级的领导的责任”，给周扬一伙的右倾投降主义以迎头痛击。

② “我的战友”是讽刺的说法，指周扬一伙。

半夏小集^①

(一九三六年)

一

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B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B：因为A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A：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

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二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②

三

“联合战线”^③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④，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四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⑤。

五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六

A：阿呀，B先生，三年不见了！你对我一定失望了罢？……

B：没有的事……为什么？

A：我那时对你说过，要到西湖上去做二万行的长诗，直到现在，一个字也没有，哈哈哈！

B：哦，……我可并没有失望。

A：您的“世故”可是进步了，谁都知道您记性好，“责人严”，不会这么随随便便的，您现在也学会了说谎。

B：我可并没有说谎。

A：那么，您真的对我没有失望吗？

B：唔，无所谓失不失望，因为我根本没有相信过你。

七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蛄食”^⑥，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⑦

八

琪罗^⑧编辑圣·蒲孚^⑨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九

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一部入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作家》月刊第二卷第一期。鲁

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本文约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下旬，正当夏季之半，所以称作《半夏小集》，当时，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很激烈。鲁迅在本文中用曲折的笔法，揭露了“国防文学”口号的投降主义实质和及其鼓吹者的叛徒、特务面目，并表示了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② 这一段是批判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的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九三六年，这篇小说在《文学》月刊第六卷第五期上发表之后，立即被周扬一伙吹捧为“收到成功的新鲜的效果”、“具有国防文学的意义”。鲁迅在这里揭露了“国防文学”的实质是宣扬阶级投降主义，而阶级投降主义正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先导。

③ 指王明以及周扬一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歪曲说法。

④ 指田汉、阳翰笙等。

⑤ 逸(yì 易)民，封建时代称避世隐居不做官的人为逸民。这一段是揭露当时积极鼓吹“国防文学”的周扬之流，象古代逸民一样只是口头上骂骂“汉奸”，实际上向敌人屈服投降；借民族抗战之名，行阶级投降之实。

⑥ 乌，乌鸦。鸢(yuān 冤)，一种鹰。蝼(lóu 楼)，蝼蛄。螘(yǐ 蚁)，同蚁，蚂蚁。这两句见《庄子·列御寇》篇。意思是死后随便给什么东西吃掉都可以。

⑦ 这里鲁迅用狮虎鹰隼的伟美壮观，来比喻坚定不移的革命者的崇高精神；“一群癞皮狗”的“乱钻，乱叫”，则是比喻折断了脊梁骨的叛徒们的“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罪恶活动。

⑧ 琪罗，法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批评家。

⑨ 圣·蒲孚(一八〇四——一八六九)，通译圣·佩韦，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

答徐懋庸并关于 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①

(一九三六年)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 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

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

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丘韵铎”三字，写成象“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大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②，胡风^③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④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

艺家协会”^⑤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⑥，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

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罢。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不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⑦ 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⑧，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讲的话^⑨，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⑩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⑪，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

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⑫，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预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象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⑬，韩侍桁^⑭，杨邨人^⑮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⑯。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⑰。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

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⑮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⑯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⑰，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⑱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②，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象辛人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③，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

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²⁴，一本杂感²⁵，译过几章《死魂灵》，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²⁶，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²⁷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²⁸，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²⁹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³⁰发表了O. V. 笔录的我的主张³¹以后，《社会日报》³²就

说 O. V. 是胡风, 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 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⑳时, 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 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 说我就要投降南京, 从中出力的是胡风, 或快或慢, 要看他的办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 有一个青年, 不是被指为“内奸”, 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 终于在街上流浪, 无处可归, 遂被捕去, 受了毒刑的么? 又有一个青年, 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 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 现在坐在苏州狱中, 死活不知么? 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象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 也没有象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㉑。同时, 我也看人: 即使胡风不可信, 但对我自己这人, 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 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 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 易于招怨, 是可接近的, 而对于周起应之类, 轻易诬人的青年, 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 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 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 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 神经质, 繁琐, 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 文字的不肯大众化, 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 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 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 也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 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 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 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㉒之称, 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 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

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⑤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象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

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复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⑦，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噤噤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识，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文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艺术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噤噤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糊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来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

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①，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大林传》^②。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③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八月三——六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一九三六年七月，鲁迅发表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击中了“国防文学”的要害，使周扬一伙大为恐慌。于是他们指使徐懋庸写信给病中的鲁迅，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歪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胡说无产阶级不应“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等。

鲁迅病中执笔作答，在这封回信中，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热烈拥护并无条件地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情地撕下了“四条汉子”的画皮，愤怒地揭露了他们这伙叛徒、特务、内奸的狰狞面目，进一步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对投降反共与卖国的“国防文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英勇地捍卫了毛主席革命路线。

周扬一伙对鲁迅坚持无产阶级原则立场恨得要命，怕得要死。解放后，他们为了给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给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翻案，千方百计想毁掉这封信的原稿；后因留有照相底版，无法彻底销毁，即于一九五六年又利用出版《鲁迅全集》的机会，炮制了一条颠倒历史的注释，胡说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是个人行动，鲁迅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是受了别人的蒙蔽，等等。鲁迅曾一针见血指出徐懋庸的信是周扬一伙一次有计划的行动，他在八月二十六日的一封信中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鲁迅当时虽然在重病之中，仍然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花了四天时间写成了这篇讨伐“四条汉子”的战斗檄文。鲁迅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记：“夜治答徐懋庸文讠”。又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中指出：“对徐懋庸辈的文章是没有办法才写的（因为没有力气，花了四天功夫）。”

② 巴金，原名李芾甘，作家。作品大多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想。黄源，当时《译文》杂志的编辑。

③ 胡风，原名张光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在蒋匪江西“剿共”军中从事反共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他隐瞒反革命历史，混入“左联”。解放后又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领导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被彻底揭露。鲁迅写文章时，他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暴露。

④ “这些人”，指周扬一伙。下文中的“徐懋庸等”、“徐懋庸式的青年”、“指导家”、“横暴者”、“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等，都指周扬一伙。

⑤ “文艺家协会”，原称“作家协会”，为周扬一伙把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筹备。后改名“文艺家协会”，同年六月七日发表“宣言”，以文艺界统一战线为名，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⑥ 这里是借用蒋介石这个口号，揭露周扬一伙在文艺界内部打击革命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活动。

⑦ 《文学界》，周扬一伙主编的文学月刊，徐懋庸是编辑之一。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

⑧ 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⑨ 指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歪曲地引用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一段话，来鼓吹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

⑩ “哥哥妹妹”、“鸳鸯蝴蝶”，指当时在上海流行的专写新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文艺；“之乎者也”是封建文学的比喻说法。

⑪ 法国的人民阵线，是法国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建立，参加的有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由他们共同组成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间历届人民阵线政府。

⑫ “另一个作者”，指周扬。鲁迅这里批驳的观点，都见他写的《关于国防文学》一文。

⑬ 杜衡，又名苏汶，参见《论“第三种人”》注①。

⑭ 韩侍桁，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曾经跟在叛徒杨邨人的后面，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文学”。

⑮ 杨邨人，参见《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注①。

⑯ 见郭沫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一文。

⑰ 徐懋庸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攻击“民族革命战

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

⑱ “白衣秀士”王伦，是《水浒传》中一个气量狭小的典型人物。鲁迅这里用他来比喻周扬一伙的宗派主义。

⑲ 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⑳ 指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风在《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

㉑ 囿(yòu 又)，这里指拘泥、局限的意思。

㉒ 指聂绀弩在《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既认为国防文学是一个“简练的创作口号”，又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明确”“更不含糊”，并没有解释两个口号的根本区别，而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区分两个口号。

㉓ 辛人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现实文学》第二期上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把“国防文学”当作短期的口号，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当作长期的口号，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

㉔ 两本版画，一本是鲁迅一九三六年一月编定、七月自费印行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鲁迅自费复印出版的《死魂灵百图》。

㉕ 指一九三六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的杂文集《花边文学》。

㉖ 指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宣言主张在文艺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㉗ 咸肉庄，上海话，即下等妓院。

㉘ “一位名人”，即夏衍(沈端先)。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指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的名称，就是鲁迅在这里提出来的。

㉙ 转向，这里是指叛变。穆木天，诗人，曾加入“左联”，一九三六年

被捕,叛变。

⑳ 《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创刊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

㉑ 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

㉒ 《社会日报》是当时在上海发行的小型日报之一,多载反动和低级趣味的文字,一九三〇年创刊。

㉓ 周文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学》第五卷第六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山坡上》,登出前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引起周文的抗议。

㉔ 田汉和阳翰笙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同时被捕,在南京狱中变节自首,七月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等保释出狱。出狱后即按张道藩的旨意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演出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反共反人民的黑戏,极受国民党政府赏识,反动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等先后设宴或茶点招待田汉等人,伪《中央日报》等反动报纸也纷纷出专刊,大加吹捧。

㉕ 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

㉖ 指傅东华和郑振铎。

㉗ 勃谿(xī 希),家庭中的争吵。

㉘ 锻炼人罪,即虚构罪名以诬陷人。

㉙ 《斯大林传》,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名《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这是原书的副题),徐懋庸译。

㉚ 奴隶总管,指周扬。周扬自窃据“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专横跋扈,不可一世,鲁迅愤怒地称他为“奴隶总管”。

“这也是生活”……^①

(一九三六年)

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愈，就会经验到；在我，则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就是两个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面前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觉得两者并无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负。现在才知道是不对的，所以并无大不同者，乃是因为并未疲劳，也就是并未出力工作的缘故。

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

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我想，强壮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过。

记得前年，也在病后，做了一篇《病后杂谈》，共五节，投给《文学》，但后四节无法发表，印出来只剩了头一节了。虽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个“一”字，此后突然而止，并无“二”“三”，仔细一想是就会觉得古怪的，但这不能要求于每一位读者，甚而至于不能希望于批评家。于是有人据这一节，下我断语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现在也许暂免这种灾难了，但我还不如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②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象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为了不给我开电灯，我对于广平很不满，见人即加以攻

击；到得自己能走动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华的刊物已经出得不少了，有些东西，后面虽然仍旧是“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③：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④。

尤可惊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缥缈录》^⑤，把清朝的宫廷讲得津津有味的《申报》上的《春秋》，也已经时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点滴》^⑥里，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象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⑦议的。但倘使我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劲咽下，也难免不能消化，在肚子里咕咚的响它好半天。这也未必是因为我病后神经衰弱的缘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讲过国耻讲义，却立刻又会高高兴兴的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人，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对他无论讲什么讲义，都是毫无功效的。

我没有当过义勇军，说不确切。但自己问：战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这样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

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

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八月二十三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是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重病稍愈后写的。一九三六年四月夏衍抛出的反动剧本《赛金花》，公开颠倒历史，咒骂义和团反帝运动，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汉奸妓女美化成“救国”的“英雄”。剧本一出笼，立刻受到周扬的吹捧，说它“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鲁迅在本文中无情地剥去了《赛金花》的伪装，揭穿了所谓“国防文学”实际上就是卖国文学。

②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字太白，唐朝诗人。诗歌多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但作品中也存在着纵酒放诞、求仙出世的消极倾向。

③ 这是周扬的话。他在《关于国防文学》中鼓吹：“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④ 义和拳，清末民间的群众组织，一八九九年改名为义和团。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瓦德西（一八三二——一九〇四），是义和团起义时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赛金花，汉奸妓女的名字。九天娘娘，也叫九天玄女，迷信传说中的上天神女；文中插入“护国”二字，是为了讽刺夏衍的《赛金花》把卖国求荣的汉奸妓女吹捧为“爱国”的“英雄”。

⑤ 《御香缥缈录》，一名《老佛爷时代的西太后》，爱新觉罗·德龄所

作。该书原本是英文，一九三三年出版，中译文于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

⑥ 《点滴》是《申报》副刊《春秋》刊登短篇文字的专栏。

⑦ 訾(zǐ 紫)，毁谤、非议的意思。

死^①

(一九三六年)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 (Kaethe Kollwitz)^② 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 (A. Smedley)^③ 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两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罩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像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〇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

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象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④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吗？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象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

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贮,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沈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⑤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象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⑥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⑦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一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⑧，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⑨，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象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

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⑩。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曾以莫文华为笔名接连发表三篇文章，为周扬一伙撑腰；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也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应该休战”，公然鼓吹“国防文学”是驳不倒的，诬蔑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宗派主义”。鲁迅在这篇杂文里，表示了与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斗争到底、永不休战的坚定立场。全文闪耀着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可以看成鲁迅的战斗遗嘱。

② 凯绥·珂勒惠支，参见《“连环图画”辩护》注⑬。

③ 史沫德黎（一八九〇——一九五〇），通译史沫特莱，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去世后按她遗嘱葬在中国。

④ 轮回，佛教宿命论的说法，认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各依善恶因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中象车轮旋转似地循环变化，生死相续。

⑤ 冥（míng 名），迷信宣传中人死后鬼魂居住的地方。又叫阴间。冥律，即阴间的条律。

⑥ 指须藤。

⑦ 指美国当时在中国的肺科专家邓医生。

⑧ 古井同“枯井”。心如古井，就是心象枯井一样，形容人的思想非常平静。

⑨ 官保，即太子少保。是对大臣及有功者的加衔。

⑩ 牙眼，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成语而来；损着别人的牙眼，即损害别人的意思。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①

(一九三六年)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瘡书》^②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③,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④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⑤,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⑥。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⑦,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⑧。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

候^⑨。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⑩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⑪，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彪^⑫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⑬。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⑭，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⑮，和“××”的×××斗争^⑯，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⑰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⑱，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⑲，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⑳，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

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⑲，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侔，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⑳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㉑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罨^㉒，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袞^㉓，粹然成为儒宗，执贄愿为弟子者綦众^㉔，至于仓皇制“同门录”^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是鲁迅在去世前十天写的一篇杂文。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对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作了正确评价，教导革命者要保持革命的晚节，永远焕发着战斗的精神，随着时代前进。

② 《馗书》是章太炎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一四年经著者第二次修订，改题为《检论》。馗(qiú 求)，急迫的意思。

③ 经学，注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小学，参见《名人和名言》注③。

④ 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该文系针对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在这封信中康有为认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而作，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三年五月的《苏报》上。

⑤ 邹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曾留学日本，竭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回国后于一九〇三年著《革命军》，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揭露清朝政府的罪恶，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拘捕，判处监禁三年，于一九〇五年二月病死狱中。《革命军》是清末鼓吹反清革命的著名著作之一，共七篇，约两万言，在当时对于打击清政府，鼓动人民反清情绪，起过很大作用。

⑥ 一九〇三年五月，章太炎与邹容同时被捕，清政府和英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宣布他们的“罪状”是：“章炳麟作《馗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西牢，即上海租界的监牢。

⑦ 《浙江潮》，月刊，清末留学日本的浙江籍学生所办，一九〇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下文引的两首诗，登在一九〇三年九月该刊第七期上。

⑧ 瀛洲，传说中的仙山，这里是指日本。

⑨ 餱(hóu 喉)，干粮。

⑩ 沈荇，字禹希，清末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一九〇三年被捕入狱，杖击毙命。见杀，就是被杀害。

⑪ 隐沦，原意是埋没沉沦，这是指人的死。

⑫ 螭彪，同魑魅(chī mèi 吃妹)，山林中的怪物；借用来比喻坏人。

⑬ 《民报》，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刊，月出一期，至二十六期停止。自一九〇六年九月第七期起，由章太炎主编，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的读者影响较大，但在文章中喜用古字和生僻字句。

⑭ 章太炎在一九〇六年九月《民报》第七期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用佛学解释社会进化现象，宣扬善与恶、苦与乐“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这是一种历史唯心论的观点。

⑮ 指章太炎主编的《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后者是当时鼓吹君主立宪的主要期刊之一。一九〇七年十月，章太炎曾在《民报》上发表“时评”，揭露梁启超等人一心想作官，并非专心立宪的政治欺骗活动。

⑯ ×××即吴稚晖(字敬恒)；引号内的××可能是“献策”二字。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期和二十二期上接连发表《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揭露吴稚晖于一九〇三年向清朝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献策”，出卖邹容和章太炎本人，致使他们两人同时被捕的罪恶活动。

⑰ ×××即蓝公武(一八八七——一九五七)，江苏吴江人，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

⑱ 指一九〇八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时到章太炎处听讲文字学，内容是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

⑲ 这是一九〇六年八月《民报》第六期刊载的章太炎《演说录》中的话。

⑳ 《中华民国解》一文最初发表于一九〇七年七月《民报》第十五

期,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⑳ 投壶,参见《趋时和复古》注⑬。

㉑ 《论语·颜渊》篇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里的“小人不欲成人之美”,就是从《论语·颜渊》篇的这句话变化而来的。

㉒ 这是唐朝著名的作家韩愈《调张籍》一诗中的句子。

㉓ 詈(lì 利),责骂。

㉔ 袞(gǔn 滚),古代皇帝和上公的礼服。华袞,指华丽高贵的衣服。

㉕ 贄(zhì 至),见面礼。綦(qí 其),极,很。綦众就是很多人。

㉖ “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几年来，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奔赴祖国的农村和边疆。他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积极投入批修整风，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代革命青年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鲁迅作品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学习起积极作用，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更好地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对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四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鲁迅杂文选 下

作者 = 复旦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

页数 = 2 6 5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1 9 7 3 . 0 5

出版社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名
目录
崇实
为了忘却的纪念
战略关系
《杀错了人》异议
中国人的生命圈
文章与题目
二丑艺术
华德焚书异同论
《伪自由书》后记
“中国文坛的悲观”
小品文的危机
捣鬼心传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读几本书
拿来主义
水性
趋时和复古
门外文谈
《准风月谈》后记
随便翻翻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名人和名言
《花边文学》序言
《且介亭杂文》序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半夏小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也是生活”
死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说明